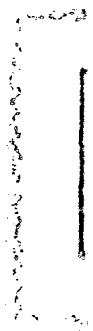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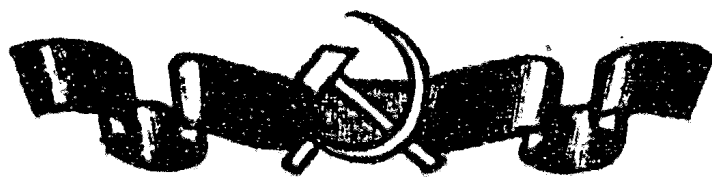


蘇聯財政制度

博高列波夫 著 吳清友 譯



Г. 博高列波夫著
吳清友譯

蘇聯財政制度

天下圖書公司出版

蘇聯財政制度 目錄

譯者序

..... 五

第一章 財政制度的經濟源泉

1 國家所有制——全民的財產 二五

2 合作社——集體農場所有制 三七

3 個人的生產經濟 四一

4 消費性質的個人經濟 四三

第二章 蘇聯國家制度與財政制度

1 財政制度之統一 五一

2 蘇聯聯邦制度與財政制度 五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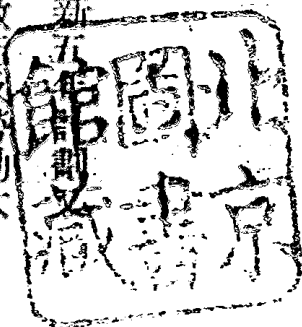
	3	財政制度中之民主原則	六五
		第二章 財政管理	七一
		第四章 國家銀行	八一
		第五章 蘇聯英勇的承平時代之財政	八七
	1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大戰後國民經濟的復興	八七
	2	全國工業化與財政	九三
	3	文化革命與財政	九八
		第六章 戰時蘇聯的財政	一〇五
結 論			一一九

565.48
180
2

譯者序

近年來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有着飛躍的進展，三次五年計劃業告完成，而戰後新五年計劃業告完成，已開始；蘇聯的經濟能够獲得如此順利的進展，一方面，固然，是因爲計劃經濟的效能及勞動大衆的努力；而另一方面，却因爲國民經濟的主要命脈，如土地，礦山，工廠，銀行等都握在國家的手裏。現在我們對蘇聯財政的本質略加申述。先從蘇聯的國家銀行說起。

科學社會主義的導師，曾經不只一次地指出，信用制度及銀行組織，在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推移的過渡時期中，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將起很大的作用。「信用制度在由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向協同勞動的生產方法轉移的時期中，將成爲有力的槓桿；但只當做生產方法中的其他偉大有機轉變的聯繫內的成分之一來把握。」馬克思並且時常把銀行稱爲「社會簿記的形式」。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也力說銀行的組織和機關對實現社會主義的偉大意義。他說：「沒有大銀行，社會主義將不能實現。大的銀行是我們需要去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機關」。我們從資本主義方面取



929044

着現成的，同時我們在這裏的任務只在切斷此種優越機關的資本主義式的生產，並把它變為更偉大些，更民主些，更廣袤些。由量轉化為質。國家銀行及其每一市鎮，每一工廠裏的分行，是最
大組織中唯一大的組織，這已經是成十成百個社會主義的機關。這是全國的簿記，全國的生產和
消費的計算，這就是所謂社會主義社會的某種細胞。

十月革命後，蘇聯銀行的國有化，是用以澈底消滅俄國地主的，也是根本破壞資產階級的統治及剷除根本壓迫千百萬勞動大眾可能性的第一步方法。銀行是近代資本主義經濟最大的中心，在那裏搜集無量數的財富，銀行網佈滿在世界上或大或小的國家中，它簡直是整個資本主義生命的神經。此種在幾世紀中生長起來的精密和複雜的機關，蘇聯第一次給它以致命的打擊，但蘇聯也就在國家銀行方面遇到殘酷的抵抗。結果它竟克服了這些抵抗，把私人的銀行都握在自己手裏。蘇聯是個具體地研究了巴黎公社的經驗，學會了應當怎樣對付資本主義的銀行和資本主義的國家銀行。但工農國家的銀行，在十月革命後的內戰時期，對蘇聯政權的鞏固會起很大的作用。

蘇聯的國家銀行，只在國內戰爭結束之後，才廣泛地展開它自己的活動。在轉變到新經濟政策的幾個月內，國家銀行才被創立起來。蘇聯為要幫助工業，農業，運輸的發展及貨幣流轉的集中，才創辦國家銀行以奠立正確的貨幣流通。

大家都知道，列寧對蘇聯金融制度的創立並使它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之問題，曾加以極大的注意。這首先是指蘇聯金融組織的最主要鍊環——國家銀行而言。

當蘇聯國家銀行創立起來的時候，蘇聯的國民經濟陷於極端低落的境地；這自然是沙皇政治，帝國主義戰爭以及白黨和資本主義國家反對蘇聯的陰謀之結果。當時俄國工業只達到戰前百分之二十，農村經濟只達到戰前百分之五十，而運輸更形惡劣。從那個時候起，蘇聯經過了許多痛苦的經驗，就用極快的步伐，恢復了國民經濟並加以社會主義的改造。在實行了新經濟政策之後，即着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奠基工作，亦即第一次五年計劃之實施，不久第二次五年計劃的綱領，又被制定了。最明顯的表現是社會生產力進步的提高和勞動大眾物質生活進一步的改善。

三十年來蘇聯經濟的高漲，衝進了貨幣經濟的中樞。新的穩定的貨幣制度之創立，是蘇聯經濟開始高漲的首要條件之一。金盧布幣制的創立，無論過去或現在，在蘇聯的經濟生活中都起很大的作用，它和國家銀行也有不可分的聯繫。

蘇聯的貨幣制度及其在社會主義建設組織中的作用，是資本主義經濟家和政治家最難了解的問題之一。但沒有一個資產階級的學者肯把蘇聯的貨幣制度，特別是國家銀行當做社會主義建設

的武器去觀察，而是把它們當做蘇聯資本主義關係逐漸復活的因素去觀察。

蘇聯的當局曾經說過：『事情完全不在於商業和貨幣制度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方面，而却在於和資本主義成份鬥爭的蘇聯社會主義成份，把資產階級的此種方法和武器佔為己有，用以克服資本主義的成份，勝利地利用它們去反對資本主義，利用它們去建設蘇聯社會主義的基礎，所以事情在於因為我們發展功能的辯證法，把資產階級這些工具根本地變更，變成了有利於社會主義而有損於資本主義的工具。』

我們可以說，在三十年中，蘇聯的國家銀行，是最大的國家銀行中之最大的，而且現在它依然是經濟命脈之一，最大的銀行組織之一。整個蘇聯經濟及社會主義建設的『有力槓桿』之一。蘇聯的國家銀行依蘇聯經濟社會主義成份的增長和國民經濟社會主義改造的展開而變更其組織，它的工作愈見雄偉而龐大。蘇聯把短期信託及無定期存款都集中在國家銀行手裏；使國家銀行在實際上變成計算生產及分配生產物的全國機關。

蘇聯的國家銀行，是發行鈔票及短期信用的銀行；同時期信用的一切事情，都集中在那裏。『貨幣流轉的集中化』是現時蘇聯國家銀行的當前任務之一。

因為生產逐年增加，商品流轉逐年擴大，工業及大部分農產品的價格受國家的規定和調劑的

緣故，所以國家銀行能够成爲唯一的發行鈔票及短期信用的銀行。這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是找不到的。

實際上，工業品（與一九二六年——二七年的價格相比較）在一九一三年只有十六億八千萬盧布，及至一九二六年它已增到三十七億五千萬盧布，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二年這四年中，就是在世界經濟恐慌的四年中，資本主義國家裏的生產品大大的縮小，而蘇聯的生產品都大大地增加起來。所以當做經濟高漲指標看待的鐵路運輸，在一九一三年只一萬九千六百萬噸，而在一九二九年已達到十二萬九千六百萬噸。至於集體農場的農民及私人農業勞動者可以按照——上形成的價格出賣許多他自己的農村經濟生產品，還不在內。但這些還不足以使蘇聯有計劃地調劑價格的方針完全地實現。

日漸擴大其地盤的社會化商品流通，依然是蘇聯手裏有力的「槓桿」；它用以消滅一切投機並調劑周圍的非社會化商品流通之價格。

這就是因爲這一點，給蘇聯國家銀行及其銀行券創立一種與現金保證並重的穩固基礎。無疑的，蘇聯的銀行券是基於全國的貨幣流通之上的。

資本主義國家現時正在悲痛地經歷着銀行的不穩定和信用交易所紊亂的苦楚，而蘇聯却因爲

有計劃經濟之優點，財政制度及國家銀行隨着生產及商品流通之增長而日臻穩定與發展。在過去的三十年間，蘇聯的信用組織有過極大的變遷。自取銷了商業的信用（期票）之後，從一九三〇年起，就轉變到由國家銀行直接貸款給生產機關及商品流轉的體系之建立。此種改革，在原則上有着極大的意義。它反映出社會主義成份的增長，社會主義經濟的進步，使國家銀行及經濟組織去適應此種過程。蘇聯的信用制度及國家銀行的信用工作性質之變更，依然供給國家銀行以充分的財源及定期流轉的保證。一九三〇年關於貨幣經濟對社會主義建設特定階級上意義的錯誤估計，在一九三一年已被蘇聯政府糾正過來了。

現時蘇聯國家銀行的信用，只在經濟機關保證定期償還借款的限度內來執行。充足的國家預算之結果，是年來蘇聯金盧布制度及國家銀行所以日趨穩定的主要條件之一。預算的不敷，在蘇聯是不容許的。而第二次大戰前歐洲二十三個國家中，有十七個常常經歷預算的不敷；英國，法國以及其他國家也包括在內。預算的不敷，甚至在美國也不是例外。資本主義國家這種預算的不敷，首先是武裝的角逐及軍國主義的增長而來的。造成資本主義生活的失常，也就是因為這一點，引起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金融的動搖和通貨的膨脹。

現時隸屬於蘇聯財政部之下，已設立了許多短期信用的專門銀行，這對蘇聯財政機關進一步

的鞏固，有着極大的意義。這些長期信用應當預付全國基本建設的一切資財，並使基本建設本身也有自力更生的能力。蘇聯的專門化銀行，就這樣地創立起來了。同時它依然保存財政和信用制度的統一，俾使對盧布之監督及建設上的經濟用度之平衡，得到幫助，這也如國家銀行在生產及商品流轉領域中所實現的職能一樣。同時此種設施是短期信用及基本投資明確劃分的表現，並使國家銀行避免一切『信用的僵化』。

基於社會主義計劃的獨立會計制度，是領導社會化經濟的契機之一，並保證蘇聯社會主義積累最高速度的主要方法。蘇聯的整個財政制度以及在財政集中化與直接信用制度下的國家銀行，反映出一切現象及獨立會計和積累領域裏微細動靜的集合點。『銀行是國民經濟的神經和焦點』，列寧曾經這樣說過。守衛社會主義的積累，擴大其來源並加快其速度，展開商品的流轉，控制盧布，明確地執行獨立會計制度，提高社會主義建設，這便是蘇聯國家銀行的基本任務。

國家銀行在蘇聯是社會經濟的中央計算機關。這種計算把整個工業及商業都包括在內。對運輸的計算，也交付國家銀行，社會化的農村經濟，也被吸到此種計算的系統中去。因此當作『社會簿記形式』以及『計算全國生產品之生產與分配』看待的國家銀行，實際上，是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組織最大的因素。蘇聯目前的任務，是在根據先進的技術，使國家銀行成爲整個社會經濟中

合理化地配置及機械化地計算的組織者。

上面已經指出，在過去三十年中，蘇聯的國家銀行是世界動盪，特別是戰後信用及金融危機日益迫近的諸階段中成長和穩固起來的。當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世界經濟恐慌時，德國國家銀行的正式報告中曾經指法：

「罕有的危機震撼了全世界。在各國中發作嚴重的經濟不景氣，已經有好幾年了。至本年的計算年度而更加深，使整個的恐慌，都帶有大難臨頭的性質。在戰後用九牛二虎之力恢復起來的金融，又重新和現金的等量破裂了，國際的商品流轉受關稅的提高，進口貨的單位以及金融的限制而縮少了。價格繼續跌落，失業無限增加，這一切是這些現象的原因和結果。在商品過剩及生產可能性多餘的條件上，消費力愈形減少了。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有更大的需要。各國愈趨貧困，大家走向破產的道路。」這一段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業已結束的今天，還是適用。此外美國的財政部長彌勒氏，於一九三一年七月七日將當時的狀況，也作了如下的描寫：

「在最近兩年來，總價格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二，工業生產降低了百分之四十四。此種價格和生產的跌落，不僅和信用的縮小，而且和整個信用機關的嚴重的震撼並行。在一九三一年中，銀行破產的差不多有二千家。就是說，佔美國銀行總數的十分之一。工業企業破產的有二萬八千

家，約佔全企業百分之一又五，這引起無量數在高度景氣時期中沒有參加投機陰謀的人民以嚴重的損失與貧困。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起至一九三一年九月止，銀行借貸的總數約低落四萬萬五千萬美金……最後這一個預算年度，不敷九萬萬三千萬美金。美國本年的不敷，約二萬萬五千萬美金，同時預想在一九三二年支出超過收入約有十七萬萬美金。如果我們把這個數字和一九二八年的三萬三千九百萬美金，一九二九年的一萬八千五百萬美金，一九三〇年的一萬八千四百萬美金相比較，我們將有容量更大的變更。」這就是東西兩半球有適當資格的證明者口中所說出來的。

蘇聯的國家銀行，就在這種資本主義經濟恐慌及資本主義經濟瓦解的環境下，來進行對外交易關係領域裏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國家銀行在這裏是實現蘇聯對外貿易的一切計算。國家銀行進行此種工作的環境，如我們所看到的，是不同的，最少是另具一格的。

自然，歐州的報紙，近年來常說到蘇聯缺乏支付能力。然而畢永丹大學裏的「俄國經濟狀況研究委員會」正從事於此種工作。我們已經看到此種委員會出版的蘇聯支付能力平衡的備忘錄。

事實是率直的東西，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通商關係的歷史中，沒有一次不盡它自己認為應當支付的義務。蘇聯所開出的商業期票，都是有保障的。

無疑的，蘇聯國家銀行的系統，也有許多缺點；如對信用工作之不充分地隨機應變及活動，

如對核算之不十分明確，對經常的定貨者沒有分類，對一九三〇年施行的信用制度之改良，認為取銷貨幣的時期已經來到等等。因此，蘇聯政府給國家銀行以下列的方針：即信用的槓桿應當在一切經濟建設部門中盡量利用，盡力使生產合理化，善用勞動力，而對不經濟的現象作鬥爭；要造成一種伸縮能力極大的信用制度，時常能夠估計到每一具體條件下，經濟機關的需要；同時國家銀行不應該給企業以的大的貸款，而減少企業對其工作的注意力，但在有現成保證的條件之下，則又不可縮小其財政上的援助，藉免妨礙其生產的擴充；國家銀行與經濟機關中應當建立一種分類的系統，以適應某一生產部門的特性；國家銀行的信用，對集體農場的商業，應給予重大的幫助，同時要動員集體農場內部的財源，使它能夠最合理地建立起財政經濟。國家銀行對集體農場商業的信用，第一，對它的款項用途（如企業場所的建築，貨物的裝璜，購買隣近農場的產品，運輸的用費等）給以最有利的規定；第二，短期信用，應當和收回貸款的期間相適應；第三，國家銀行的信用，應當使集體農場及時集中內部的資財向國家負責，償還債務，這都是現在國家銀行所應盡的重要任務。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之成功，主要原因之一是由於蘇聯有計劃的財政制度，後者幫助它順利地動員建設所需的資財。一九三二年，加里寧氏回答德奧等國勞動者代表的一席話，完滿地解答了這

個問題。他說：

「這些巨額資財從何得來的呢？——這問題是應該發生的。在我國有獲得此種資財的可能性。我們是從急速增大着的國民收入中得來的。世界上最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就在好景氣時，國民收入也不過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的增加，最好的時候，也不過百分之四；但我們的國民收入迅速的增大，使我們的社會建設有其可能。

「國民收入又爲什麼能急速增加的呢？第一，我們的戰前及戰時沙俄政府的負債都取消了。還在「布爾喬亞」的代表者的確是痛苦的事，但在我們，不取消這些債務，則每年單是利息必須付出二十億金盧布給各外國。第二，在我們這裏，國民收入久已不受寄生階級——地主，資本家所吞沒。在我們這裏，看不見寄生階級的奢侈生活。許多外國人，只就我們生活的外表觀察，得到我們生活非常貧苦的印象。這印象是不正確的。我們沒有豐裕的生活，誠然是事實，但我們不使國民收入爲不生產的浪費，我們爲促進社會主義建設，必須蓄積巨額的資金。第三，你們各位都知道，資本主義國家預算的大部份都被軍國主義的經費所吞沒。英國預算約百分之四十爲海陸軍費；法國，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及義大利的預算約三分之一；其他各國則以二分之一以上直接間接以充軍事目的之用。然我們的國防經費則並不超過國家預算百分之六又八以上。……第四，

我們在國家及經濟的一切領域中，嚴密地加緊振興國民經濟。我們爲今後經濟的發展，把主要的資財投於新建工廠及經營，投於原有工作及經營的擴張與改造，並以其餘投於文化目的用途。資力的極大部份，都用以發展生產。生產激增，使國民收入爲正比例的飛騰。……

在蘇聯整個社會主義經濟中，無論是生產的或其他的經濟計劃，在財政計劃中，都找到它自己的貨幣的表現。在蘇聯，財政計劃包括企業的經濟活動的各方面。對每一事業來說，財政計劃是必須執行的指令；同時，它是管制和影響企業的生產——財政——經濟活動，動員企業去完成在它前面所提出的生產課題，並歸結到財政預算和出納制度的鞏固。作爲各種活動之指標的財政計劃之結果，規定了企業與國家財政制度的財政上的相互關係。

正確的財政計劃，和高度的財政組織，保證生產所必需的資財之供應不會脫節，並促進企業的補充資財之剖明，後者應當歸結到財政地位之更加穩固。

對財政計劃執行的管制，使剖明經濟機關各種工作之成就和缺點，成爲完全可能。企業對生產以及其他計劃之執行的任何脫節，立刻反映到完成財政計劃的結果上來。

生產計劃之超過完成，由減輕成本而來的節約，內部資源的動員，供應和銷售正確的組織——這一切之幫助國家預算收入部份之完成。如果不能完成生產計劃，是說明產品成本之更加

昂貴，供應和銷售組織的惡劣，結果導向財政狀態之不能令人滿意，影響到計劃所規定的積累之減少，由這些缺點所造成的財政困難，必然會使經濟機關，不能完成其對國家應負的責任，更明顯點說，不能把所指定的數目，繳納到國家的預算中去。

因此，對完成財政計劃之日常的監督，成爲企業的領導者最重要的責任之一。此種監督幫助經營者在企業中進行各種經濟活動，及時揭露並糾正所已發現的缺點。財政計劃之實現，是建立在生產，供應，消費，大規模建設以及某一經濟單位各種收支預算的基礎上。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通常把財政只當作國庫出納的手續，而與國民經濟相對立，在蘇聯則完全不同。蘇聯的財政制度，把整個社會經濟的體系，整個國民收入再分配的貨幣關係，包括到自已懷抱中去。各級財政機關的計劃，例如預算，信用，保險都列入財政計劃的範圍內。它們並不由自己直接實現國民收入的積累，而是與全國的國民經濟計劃和初級機關（企業，國營農場，商業組織）及經濟團體的計劃配合起來。在蘇聯，生產手段的社會化，以及全國經濟生活的組織化，是基於統一的國民經濟計劃，後者預先決定了整個社會主義經濟財政制度之統一，及其計劃的統一。

財政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有着巨大的意義。社會主義國家透過財政制度，在各經濟部門及各

經濟區域中，與所規定的經濟發展計劃相配合的條件之下，分配國民的收入。這樣一來，行政和國防的經費，獲得資財的滿意來源，而人民的文化以及其他社會需要，也有的款可資運用。上面已經說過，蘇聯政府在財政制度幫助之下，施行對社會企業工作的督導，並影響各種經濟部門完成生產計劃的進程。

在蘇聯，雖然財政關係及其計劃的方式，有各種各樣的差別；但有一個共同點，這就是財政計劃，它永遠是貨幣運動的計劃，其目的是在保證物質價值和勞動力一定的轉移。所以財政這一名詞，在蘇聯是這樣了解的：它是貨幣關係的某一部份，在其幫助之下，組織社會主義經濟中國民收入之積累，分配，及再分配。

在蘇聯，財政計劃有兩個基本的特點，與其他各種計劃，有重大的區別：第一，蘇維埃國家在財政制度面前所提出的任務，是財政計劃在貨幣幫助之下，或者更正確點說，透過貨幣而實現。在蘇聯，生產，流通或物質價值需要的真實過程，掩蔽着貨幣資財聚合和支出的過程。可是蘇聯財政制度完成其國家經濟政策的課題，不是用直接轉移或重分物質價值的方法，而是用貨幣的提供並加以分配來影響經濟發展真實過程的方法。在這種意義上說，財政計劃是社會主義的經濟貨幣資源，它的來源及容量，它的方向及支出程序的計劃。

第二，財政計劃，在蘇聯各種經濟計劃中，是最大的，它是綜合的計劃。財政計劃包括各種經濟指標的廣泛範圍，並提供它們的最為概括的表現。蘇聯財政計劃的此種特點，是由社會經濟組織內，貨幣及貨幣制度所有的作用中產生出來的。

在蘇聯，物質價值的生產，轉移，和消費構成每一財政計劃的經濟基礎。三次五年計劃之完成，以及戰後新五年計劃的實行，都證明蘇聯擁有充足的資源以及財政的充份武器來籌措歷史空前規模的經費，以改造和發展國民經濟，以籌措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巨大戰費以及戰後全國復興的費用。

在蘇聯，財政與財政計劃不能與國民經濟計劃的物質生產成份相對立，因為這兩種計劃同是表現社會主義經濟再生產的統一過程。然而不能從這裏做出結論，說財政計劃是國民經濟計劃的消極成份，以及財政計劃只是計劃的各種物質成份之單純技術上的預算罷了。實際上，財政制度是蘇聯爭取社會主義建設鬥爭中，蘇維埃政府經濟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例如關於生產增長的一般速度問題，大規模建設的容積問題，以及積累和消費的相互關係等問題之解決，遠超出財政計劃的範圍之外；但財政計劃提供許多極為有價值的材料，幫助國民經濟計劃中這些關鍵的經濟問題之解決。

顯然的，財政計劃在蘇聯確定生產和貿易之物質指標時，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應當明白，若干物質指標的直接計劃，例如生產及貿易組織物質價值儲藏的標準，每一學生費用的限度，小規模的投資等，都難願加以恰當的規定。在此種場合，透過財政計劃機構，特別是在審查預算時，由組織的，經濟的設施加以調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最後應當指出一點，在蘇聯，財政計劃之編製，是根據經濟及文化等相當部門工作條件之仔細的分析。這便在編製計劃時，容易發現其盈虛的狀態。尤其應當注意的，就是財政制度對完成國民經濟計劃之有組織的管制中所起的作用。

蘇聯的財政——信用機關制度，應當日常地管制一切經濟部門完成計劃的進程，並賦予它們與完成計劃有關的相當資財；同時並採取辦法，預防個別部份的脫節。蘇聯的財政制度，是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積極因素，它機動地管制執行國家規定的計劃之進程。

蘇聯當局對於財政部門一向加以極大的注意。他們認為必須消滅浪費的現象，儘量動員內部的資源，在各個企業中鞏固獨立會計制度，有系統地減輕成本，加強工業內部的積累。在這種意義上說，蘇聯的財政計劃，以及對完成經濟機關財政計劃之管制，佔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在蘇聯，財政機關實際上以日常的工作與各種企業和機關聯繫起來，這使蘇維埃國家有可能廣泛地利用財

政制度以組織對社會主義經濟中積累進程之管制，以與浪費現象作鬥爭，以鞏固獨立會計制度。

因此，蘇聯的財政計劃，在國民經濟計劃體系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蘇聯政府在財政計劃幫助之下，容易剖明社會主義經濟資源的容量，並與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政策之任務相符合，在貨幣形態上，實現此種資源的再分配。蘇聯政府在財政計劃幫助之下，實現國民經濟計劃各種成份之聯繫，並對國民經濟計劃之完成的進程加以管制。

蘇聯當局認為三十年來，在財政制度及財政計劃方面，雖已達到巨大的成就，但還須進行巨大的工作，以求進一步的改善；首先必須提高每一企業和每一經濟部門，以及計劃的個別成份及其整個財政計劃之經濟基礎的素質，其目的在預防經濟發展中不平衡現象的發生；同時對經濟中財政——支付紀律之鞏固，也加以極大的注意。

蘇聯各次五年計劃，都提出一個中心的任務——在經濟關係上，趕上並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為要解決這個任務，必須大大地發展生產力和增加生產品，必須作巨大的投資，同時又要顧到國民消費的增加，國防能力的鞏固，以及國家所必需的後備資源之創立。這一切任務之完成，是與勞動生產率之提高，與國家資財支出之浪費和不合理作鬥爭相關聯。在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展開斯達哈諾夫運動，改進工作素質之基礎上，首先應當保證社會主義積累迅速的增長。無

庸置疑，在實現這些任務時，蘇聯財政制度過去和現在都起巨大的作用。蘇聯當局屢次着重指出，改進計劃工作之必要，並把它與預算信用工作改進的任務密切地聯繫起來，同時與獨立會計制度之鞏固，與浪費現象作鬥爭，與重工業，以及國民經濟其他部門支付能力的提高，並在社會主義生產之發展，商品流轉之開展，以及人民物質生活水準之總高漲的基礎上，加強蘇聯財政狀況，加強盧布地位，改進財政計劃，並改進整個財政制度。

我們知道，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者，並沒有詳細地規定，究竟應當利用怎樣的方法來實現社會主義資源的再分配；但蘇聯當局吸取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之經驗，認為應當掌握作為資產階級經濟工具的貨幣，銀行，信用以及整個財政制度，並利用它們來幫助社會主義的建設，而蘇聯在這方面，終於獲得了優越的成功。

近幾年來，蘇聯出版了不少檢討和介紹其財政制度的書籍，其中譯者個人認為較佳的是辛格爾氏（E. Steiner）所著的『蘇聯財政計劃』（一九四〇年，俄文版，莫斯科）；列昂捷夫氏（V. Leontev）所著的『財政計劃及圖解』（一九四五年，俄文版，莫斯科）；以及譯者這裏所介紹的，博高列波夫氏（M. I. Bogolepov）所著的『蘇聯財政制度』（一九四五年，俄文版，莫斯科）；這本書的原作者是蘇聯最大的財政問題專家，他是應英國讀者的要求而寫的，所以內容

非常簡明扼要，英，法，德文均有譯本，其價值無庸譯者贅述。截至此刻為止，中國出版界關於蘇聯財政制度之介紹，並不見多。一九三八年美國韓賽歐（Paul Honsell）教授所著的『The Public Finance of The Union of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一書，雖已有人譯成中文，但因原作者對蘇聯存有偏見，措詞頗欠客觀，而材料亦較陳舊，是則譯者對博高列波夫氏此書之介紹，其於願意了解蘇聯財政制度真面目之讀者，或有幫助！至於譯文如有錯誤或忽略之處，尚希有以教之！

吳清友

第一章 財政制度的經濟源泉

1. 國家所有制——全民的財產

蘇聯的財政制度，對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經濟之制度組織，曾經有過偉大的服務。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及其匪幫的戰爭，現在業已勝利結束了。蘇聯的財政制度，順利地解決了巨額戰費之籌措。此刻在蘇維埃國家面前提出的，是：在被法西斯的野蠻行動所蹂躪了的各區復興工作的巨大問題，富於籌措各屆斯大林五年計劃經費之經驗的蘇聯財政制度，很有自信地着手解決這巨大規模的新任務。

在和平建設的數十年中，以及引導蘇聯卓絕地戰勝自由與民主之敵人的戰爭年份內，蘇聯的政治組織和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制度，向全世界矚目和確信地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各種優點，關於後者，斯大林於一九三〇年在聯共（布）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曾經作了詳盡的說明。在觀察蘇聯國家機構時，在觀察這個國家的一切活動及其全部歷史時，這些優點就十分卓著地表

露出來。在分析蘇聯財政制度時，社會主義制度的優點，就十分明顯；因為財政制度的結構及其功能的本質，歸根結蒂是由社會主義經濟的結構和國民經濟的國家計劃之任務所規定的。

認識蘇聯財政制度，從觀察創立社會主義財政的國家資源的那些基本經濟源泉開始，最爲妥當。

這些源泉，在一九三六年蘇聯憲法第一章中最完全地列舉出來了。在憲法中指出（第四條），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以及生產工具和手段之社會所有制，是蘇聯的經濟基礎。在憲法的下一條指出，社會主義所有制，在蘇聯或者採取國家所有制的形式，或者採取合作社，集體農場所有制的形式。

描寫社會主義財政制度的經濟源泉，必須從國家所有制開始。

在蘇聯，生產工具和手段的基本量，是被集中在國家手裏。全部土地及其蘊藏，也屬於它。集體農場獲得土地無限期的使用。其次，如水利，森林，製一廠，運輸和交通，由國家所組織的農村經濟大企業，公用企業，以及都市型的住民區的基本住宅基地，也屬於國家。在這種所有制的基礎上，國家進行廣泛而複雜的經濟及其經濟活動，這是國民收入生產總過程的基本要素。

現時已有的這樣巨大規模的國家經濟，自然不是立刻就形成的。它是蘇聯存在以來，即是一

一九一七年十月起所施行的有計劃的經濟政策的成果。遠在一九二五年，小私有經濟，把全國各種生產基金的百分之四十四又七，握在自己的手裏，而在資本主義經濟殘餘方面，這些基金也達到百分之六又五。蘇聯的經濟結構，在初期還受舊制度殘餘所積壓。這一切很快而澈底地被清算了。全國經濟從一個階段轉向另一階段，同時在邏輯上不可免地也改變了蘇聯的財政制度之形式和內容。因此，在包含不滿三十年的時間中，由於經濟和財政非常機動的結果，蘇聯經濟和財政的歷史，創立非常豐富的內容。

像目前形式的國家經濟，沒有完全列入國家財政制度的軌道。國家經濟，這是蘇聯經濟的基本部份。國家經濟及其各種企業的貨幣積累，這是蘇聯經濟與財政制度發生結合的基本項目。這些積累，在經濟的基本部門間以及在廣袤的國家個別區域間分配之必要，是把積累，即是把重新構成的國民收入之巨大部份吸收到財政制度中去的主要動力。此種分配，是由完成國民經濟發展總計劃的經濟政策之任務所規定的。在計劃中，被認為不應分配的國家經濟貨幣積累的那一部份，依然留在經濟的個別部門支配之列，它在那裏構成國家企業獨立經營的基礎。

從這裏可以明白，在國家經濟懷抱中所產生的國民收入，不是全部列入那裏去以作進一步的分配；因為，貨幣積累的大部份，是被集中在國家的主要財政機構——國家預算中。蘇聯國家預

算的龐大規模，主要可用這一點來解釋。這一點，也可以解釋蘇聯存在以來的全部歷史時期中預算速度不斷的增長。蘇聯預算的規模，是在內容不同的兩個原因影響之下而增加起來的：國家經濟範圍本身經常的擴大，以及國家企業經濟活動順利的發展。

把巨大的國家經濟之貨幣資源吸收到蘇聯財政制度中去，以及把這些積累集中到國家預算中去，構成蘇維埃財政制度和蘇維埃預算最顯明的特徵。這一點完全不允許把它們與其他國家的財政制度和預算作單純統計上的比較。財政數字單純的比較，所得到的不一定不是結論，而是誤會。

從這裏可以看到，商品及勞務（指不直接生產物質價值的企業，例如運輸而言——譯者）的價格，對財政制度有着巨大的意義。它大半規定財政制度所聚集的貨幣積累之水準。但此種制度對商品產品之成本，也並不缺少興趣。因為在成本水準中，某種價格的動搖，能夠降低或提高積累的總數。在財政制度對國家企業商品生產條件的此種直接興趣之基礎上，在蘇聯，財政制度對生產過程的控制功能，就這樣地被組織起來了。財政制度在每日聚集積累的過程中，起着觀象台的作用。它從那裏可以很好地看到生產過程中可能的脫節和失調。財政制度不僅記錄這些失調，而且必須積極地干涉企業經濟活動的行程，用財政影響或建議經濟管理的相當機關採取改進等方法，來糾正所發現的缺點。在蘇維埃國民經濟史的全部歷程中，財政制度曾經是蘇聯經濟政策最

積極的因素。

在發展國民經濟的國家年度計劃中，關於生產成本問題，劃出一個中心的地位。國家的計劃在國家企業前面每年提出有系統地降低生產成本的任務。在這些企業產品的巨大規模條件下，成本降低百分之幾，都是保證數達幾億的積累之增長。這些數目載在財政計劃中，其完全的責任是落在財政管理機關的身上，經濟和財政計劃的此種直接聯繫，把財政制度不倦地積極化起來，並使它成爲蘇維埃國家經濟總政策的有利因素。

國家企業所生產的勞務和商品價格，在國家所規定的生產價值中，找到自己的基礎。蘇維埃的價格政策，是受從國家經濟總計劃之任務的本質中所產生出來的各種動機所規定。在價格政策中，基本和不變的領導動機，是：第一，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利益之完全的保證，以及第二，勞動者福利水準之提高。因此，價格被利用作按照計劃規定的國民收入分配之有力因素。

生產成本有系統降低的任務之解決，對價格政策有着直接的關係。當累積規模增加起來的時候，此種降低，同時創立經濟的基金，後者被利用以降低生產手段以及消費資料的出廠價格。

財政制度與國家企業生產之直接結合，從上面所說的當中可以看到，它是此種制度最大和最積極地參加國民收入分配的結果。

爲着收集企業的積累，然後按照計劃所規定的加以分配，財政制度只有一條道路走近積累——通過價格。商品的價格，被分散爲它自己的諸成份，而它的個別成份完全地或局部地進入財政制度的支配中去。任何價格首先分爲兩個基本部份：支付生產和銷售費用的成本，以及單純再生產的支出（基金的零還），另一方面是積累。

此種積累可能完全加進作爲自己企業之所有者的國家歲入中去；在實際上事情要複雜得多。此種複雜性是受雙重考慮所規定。某些複雜性，是由於國家在它自己企業方面取去積累，力圖在企業領導者以及工人方面創立對自己活動及勞動之結果的直接興趣。國家課予自己的企業以獨立法人及獨立經濟單位的形式。從國家方面獲得基金及週轉金歸於自己完全運用的企業，進行獨立的經營，有它自己的平衡，自己的銀行結帳，在銀行取得信用之權，以及最後獲得平衡利潤之權。在支配此種利潤時，企業顧到自己的需要，以及劃出特定的數目，以改進勞動者和職員的生活，並付給生產中成績最佳的工人，工程師和職員以獎金。

由於這些考慮，出產商品的企業之貨幣積累，一般通例是爲兩部份：一部份有時是最大的，在商品實現化（變爲現金）之後，進入國家的預算中去，而這是在企業平衡的聯繫之外來進行的。這一部份積累，是用所謂週轉稅的課稅方法被徵集到預算中去。另一部份積累，即是商品成

本及其批發價格之間的差額，留在企業之平衡中，並且構成它的利潤；此種利潤，也如積累的第一部份一樣，屬於國家，但它不完全地，而且是在特種程序上加入財政系統中去。

因此，國家企業所生產的商品之批發價格，一般通例是由三種成份：成本，週轉稅和利潤構成的。

這三種成份，在個別商品價格中的配合，以及它們在價格中的比重，遠不是千篇一律的。在某些商品的價格中，這三種所指出的成份都存在着，然而比例極不相同。這是批發價格最特別的形式。在另一些商品價格中，只存在兩種成份：成本和利潤。在個別場合，可以遇到只夠商品成本的價格，而且有時把價格暫時規定在低於成本的水準，這歸咎到企業平衡的損失（腐蝕），後者由國家預算彌補之。

價格結構中的此種差異，其結果，使蘇維埃的價格政策，是追求由國家計劃提出目標的總經濟政策之武器。基本的生產手段和生產工具，是按照保證鄉村以廉價的拖拉機，保證工業以廉價的煤炭，五金的最低的價格而實現（變為現金）。因為重工業品也在每年生產巨額投資到國民經濟中去的同一國家經濟內消費着，那麼，不言而喻的，把這些產品的基本部份之價格，維持在最高的水準之上，是沒有根據的。這些商品價格之昂貴，自然將歸結到一切其他商品價格提高的必

要，因為後者之生產，須要重工業的產品。因此，生產工具和手段的價格，其本身或者完全沒有包括週轉稅，或者包括週轉稅極爲微小的規模，例如百分之一。包括在價格中的此種不大的稅率，不言而喻的，沒有很大的國庫收入的意義，但它是對生產過程的財政控制之橋樑；因為，週轉稅的交付，是反映對某一企業所規定的計劃之量的課題之完成。

舊俄的重工業，以不大發達爲特徵。它有許多部門完全沒有發達起來。在蘇維埃時期，特別是在斯大林五年計劃時期全國工業化的條件之下，俄羅斯的歷史終於創立了許多全新的部門，特別是在機器製造業，化學等領域內。新的生產，需要相當時間以便完全把握；在這個時候，它們產品的成本，還是遠離正常的水準。在這種成本不正常的水準上建立批發價格是不方便的。因此，在那些場合，價格不僅沒有包括週轉稅和利潤，有時甚至於不够成本。過了新生產或新生產方法業已把握的時期，價格終必倚靠正常的成本，並保持企業正常的利潤。

同時，週轉稅提供國家記錄國家經濟一切部門平衡利潤水準的可能。假使沒有此種稅則，那麼在那些部門，它們根據某種動機，把價格維持在昂貴的水準之上，例如在製造酒精飲料或烟草製成品工業中，利潤必須達到過高的規模。這可能削弱個別企業領導者們經濟的刺激，且將歸結到企業貨幣積累的閒置。這兩種現象，都被週轉稅所消滅了。

一般通例，每一個別商品只征一次週轉稅。如果某一商品對某一企業是製成品，當它賣給別的企業時，須付捐稅；那麼把它進一步加工的場合，使此種商品產生新的品質和新的價值，此種商品可能（但不一定）再課一次週轉稅，在本場合，也如在其他場合一樣，課稅是決定性的動機。

週轉稅在一切場合，都不是構成價格的因素，而是由計劃所規定的價格之結果。在規定週轉稅項的時候，價格依然佔着首位。因此，在技術上是這樣：在價格中所規定的週轉稅之百分額，本身已經假定地包含稅率。可以舉出這樣的實例：某種商品每一件假定按照一百五十盧布出賣，它的成本規定為一百盧布，週轉稅指定為對價格的百分之三十（四十五盧布），這樣一來，利潤的份額是留五個盧布。假使根據經濟政策的判斷，商品的價格必須降低，那末這通常是由週轉稅額的降低以達到。在價格高時，稅額也將提高。一句話，完成國家企業貨幣積累聚合的財政方法之作用時，週轉稅是價格政策的充份伸縮自如的武器；因此，稅額以不大變化為特徵。

從事非物質價值之生產的國家企業，所謂勞務（運輸企業等等）是以特別稅代替週轉稅，繳交給預算。此種特別稅，是按照週轉稅的形式，但以不一致及不高的稅率為特徵（所謂非商品活動的稅則）。

從企業支配的總收入中，留出支付產品成本的數目，而多餘的則留作它們的利潤。由於企業之基本修理而提出的這一部份數目，依然留給企業支配，並被集中在國家銀行的它的特種戶頭中；被指定作新建設的其他部份，則由企業轉解到長期投資的專門銀行，並且可能被銀行用於同一經濟部門的其他企業上去。

企業的利潤，依其規模來說，構成它的積累之微小部份。經濟計劃規定維持經濟某一部門利潤平均水準所期待的利潤。此種平均水準，依繫於本部門的需要性及其週轉金之補充，在各別部門中，不盡相同。

兩種成份能够構成某一企業利潤的總數：如果企業由於順利地完成對它所規定的生產計劃，達到勞動生產率大大的提高，並減低它自己產品的成本，比計劃所預定的還要多些；或者產品製造的數量，超過計劃的課題，那末它就得到比計劃所預定的更多的利潤，對超過計劃的利潤之動用，則由特種程序規定之。

計劃的利潤，首先是一種源泉，企業從那裏吸取擴大生產以及補充自己週轉金的資財，如果這兩種在它的年度計劃內（計劃的草案，是由企業本身加以編製）都有預定的話。在此種場合，企業劃出所得的利潤之自由剩餘，交給國家預算。如果所剩的利潤，對所指出的目標是不夠的

話，那麼企業不把自己的利潤劃給預算，而相反地，從預算得到補充的資助。

如果企業本年度沒有進行它自己基金的擴大，以及不需要補充自己的週轉金，那末它把全部所得的利潤劃給預算。在企業中構成週轉金多餘的情形之下，此種多餘的也歸預算中去。利用利潤的此種程序，自然歸結到劃給預算的利潤之百分比逐年動搖不定；因此，它每年在計劃中須加以核定；其次，它對個別企業，自然，也是不相同的。這末一來，把全部利潤的一半左右，轉交給預算，而其餘的一半，則留給自己支配。因此，在國家收入的預算數字表中，充其量只填寫國家企業工業利潤的一半之譜。

對上面所說的，還須增加一點：戰前，即是一九四一年前，企業從沒有超過計劃課題的利潤中，劃出百分之二，以充所謂經理的基金。至於超過計劃的全部利潤的百分之五十，也劃到這個基金中去。超過計劃的利潤的其餘的百分之五十，是服從計劃利潤分配調整的規則。

經理基金之創立，是用以刺激企業的經濟工作。此種基金是受企業的經理們之支配，但其支出則須根據特種法律所規定的用途。被計劃預定作為基本工作部門之用的總數之外，基金的一半，被指定為工人及職員的住宅建設之用。另外的一半，用於工人和職員的生產需要——托兒所，兒童園，俱樂部，食堂，用於優異工作的個人獎金，用以支付合理化建議的獎金等。經理基

金的總數，常常達到巨額的規模，在若干場合，企業的每一工人可達五百甚至一千盧布以上。戰時因經理基金的徵收，企業獲得在特種程序上獎勵廣泛地展開社會主義競賽的優異工人之權利。

到此刻為止，是說明蘇聯財政制度對國家生產企業的關係，而運輸也包括在內。至於說到國家的商業企業，它們不繳納週轉稅，因為它們販賣的商品，已經征過此種稅。商業企業與週轉稅發生關係，只在下面這種場合：如果它們有輔助的生產企業，其產品根據一般的原則，須繳納週轉稅；商業企業利潤的根源，是由於零售價格超過批發價格而來的，除了支付計劃所預定的投資之外，其剩餘的部份則繳交預算。零售價格也如批發價格一樣，是由國家政權來批准。

在三年內（一九三八——一九四〇），蘇維埃國家預算收入的總數，計為四千五百億盧布。在這個總數中，週轉稅佔二千八百三十億盧布，而從各經濟部門的利潤中劃出的，則佔四百八十億盧布；根據這兩種方法而集合起來的國家企業之積累，以及從合作社企業而來的，總共三千三百八十億盧布。因此，蘇聯全部預算收入，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十五都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活動的成果。

2. 合作社——集體農場所有制

蘇聯國民經濟基金的一部份，即是作為國家財產列入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範圍內的生產工具和手段，後者構成各種合作社組織和集體農村經濟（簡稱「集體農場」）的財產。此種財產，同樣地成為——依其規模來說，是廣泛的，——生產的基礎，特別是集體農場的財產。

合作社——集體農場與國家財政制度的聯繫，比國營企業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礎上。合作社——集體農場的收入，是屬於勞動者及其成員的組合本身，並且根據這些組合的規章而分配。上舉的組合，用繳納所得稅方式，參加國家預算資財的構成。

但當工業合作社將其商品投到市場去時，還有一種財政的義務——繳納週轉稅。此種義務是永遠力圖消費品市場上價格一致的蘇維埃價格政策所制約。因此，合作社制度內部的合作商品流通，是豁免週轉稅，而只當合作社的商品落到單獨的消費者手裏時，它才繳納上指的稅項。在此種場合，如果沒有捐稅，或將歸結到價格統一原則深刻的破壞，或將歸結到合作社企業在其自己的支配中，獲得不是由它直接經濟活動所招引來的非常巨大的利潤。但對合作社商品的週轉稅，比對國營企業的商品，是按照低徵的稅率而徵收。下列各點，是此種稅率減低的基礎：合作社的

生產組織，把小手工業者和技匠聯合起來，他們以前在家裏孤零地工作，甚至就在聯合之後，也常在自己家裏繼續工作。因此，小手工業的設備品，與技術上最簡單的設備品有所不同；它，自然，比甚至中等工業的現代技術，也差得很遠。同時生產合作社所加工的原料，常常屬於低級的品種，而且不少是大生產的廢物。另一方面，個別的合作社，把沒有具備完全價值勞動力的人們結合起來（殘廢者，領撫卹金者，盲，啞等聯合會）。因此，此種組織的生產成本，自然比工業型的中，大企業要高些。

生產合作社，依其產品規模來說，佔有非常重大的地位，而且屬於國民經濟日益增長的部門之列。一九三七年，生產合作社把自己價值一百三十九億盧布的產品拋到市場上去，而一九四〇年，則超過二百三十億盧布。同時合作社的生產，收益甚豐：一九四〇年，它的利潤計達三十億盧布。此種利潤，也是課徵所得稅的對象，後者的稅率，依繫於利潤的總數和收益的規模而不同。在蘇維埃財政實踐的一切場合中，是把它作為利潤總數對產品成本總數的關係而加以了解。

在農村經濟領域中，集體農場是國民勞動社會主義組織最明顯的形式。農村經濟的集體化，從經濟的觀點來說，是意味着代替渺小經濟制度的農業大生產之組織。土地上的大生產決定了農村經濟中機器，以及我們時代的全部先進農業技術之廣泛的應用。從這裏可以明顯地看到，集體

農場的生產，與我們剛剛說到的工業合作社組織的生產，有着巨的差別。

在徵集資源的過程中，國家財政制度與集體農場在兩個方向上發生聯繫：一種是關於集體農場總收入的國稅，而另一種是集體農民的個人收入。這兩種稅則，都是所得稅型的。這所以必泉，是由於集體農民的收入是從兩種源泉來給養：從集體農場的總收入，以及下節將要說到的其他源泉。集體農場的收入，特別是採用貨幣形式的，與國家經濟有很大的聯繫，後者是集體農場產品的主要購買者。自然，集體農場的收入，大半是由國家取得它們產品時的價格所規定。國家取得集體農場的產品，有兩種形式：一種形式是按照比較低廉的價格，必須賣給國家；另一種是按照較高的，但是確定的價格，自由購買。下面這個非常重要的事實：按照最適度的價格，把技術設備品貸放給集體農場及其企業，——其價格常常不包括週轉稅在內，而且甚至與成本的規模相接近，——是對集體農場的價格政策之經濟基礎；同時集體農場從國家方面取得機械化的生產工具，用最優待的銀行信用辦法，盡量使其容易。

集體農場把自己產品的大部份，按照確定的價格銷售給國家，自然不課週轉稅。在下列這些場合：它們把自己的產品在集體農場的特種市場上讓與給其他購買者（國家不在內），例如生產和消費合作社或個別公民時，集體農場也不要繳納週轉稅。這是對集體農場最重大的財政優待之一。

集體農場的所得稅，是按照兩種稅率來徵收：一種稅率——從收入課稅百分之四，——是應用於集體農場自己用於內部生產需要（耕作儲備種籽的基金，糧食的保險基金，以及幫助集體農場殘廢者之基金等）的產品所代表出來的那一部份的集體農場收入。另一稅率——從收入課稅百分之八，——是向集體農場成員之間進行分配的收入而徵收。因此，他們由在集體農場的工

作而得到收入的那一部份，依然免稅。

上面所說的，也應用到集體農場依然採用實物形式的那一部份收入。至於說到集體農場的貨幣收入，那麼對這種收入只課徵百分之四的稅額，此種收入是在國家收購的程序中，由於出賣技術作物，園藝，牲畜等產品而獲得的。至於對從集體農場市場上出賣植物及動物產品而得的收入，以及他們服務（運輸，以及場外的貨幣工銀）的收入，則課徵百分之八。

在蘇維埃財政的實踐中，賦稅通常不僅被利用作收集財政資源的方法，而且也被利用作經濟和社會政策的武器。因此，在集體農場的所得稅法規中，也預定給集體農場生產結構以財政影響的可能。預定給下列這些農場以重大的優待：由遷移到新地方的農民組織起來的，或者把遷移者接納到自己的圈子中去的。居住蘇聯廣袤北部各區（凍土地帶）的各民族之集體農場，豁免所得稅，這樣做，是為着鼓勵養鹿業，皮毛工業，以及一般是為着活潑北極的經濟生活，集體農場所

得稅法規，預定當個別農場受到某種天災時給與優待，並完全豁免賦稅的可能。

在預算收入總數中，佔有比較不大比重的集體農場所得稅，是屬於飛快增長的財政來源之列；一九三二年它提供一億二千三百萬盧布，經過五年（一九三七年）已達五億三千五百萬盧布，而在一九四〇年——則達八億盧布，這是集體農場收入和集體農民福利不斷增長的最顯明的指標之一。

3. 個人的生產經濟

至於說到個人的生產經濟，那就應當指出，在國民經濟的廣泛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對個人的生產經濟，也有其地位。每一集體農民的家庭，有其自己的房屋，以及它在那裏進行副業的住宅附近的地段，菜圃，花園，禽鳥以及小型農具均列入此種經濟的成份之內。集體農民家庭此種個人經濟的產品，完全受它自己支配，並可以按照自己的價格出賣之。

集體農民的個人生產經濟，在組織上，是屬於集體農場制度，即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形式之一。但蘇聯現行的憲法，也允許個人生產之存在，——這是小商品和渺小的經濟大海中極為可憐的殘餘，它在蘇聯所經歷的數十年中，已把自己的位置讓給集體農場了。憲法對此種經濟形態

之容許，是由一個要求——完全放棄對他人勞動的剝削所規定的。

這些依其規模來說極為微小的經濟，在現時是農民的農村經濟以及技匠——手工業者（如果他們沒有加入勞動組合的話）所代表出來的很小的一羣。

對此種集體農民的個人經濟，以及其他勞動者的經濟，雖然他們也沒有剝削別人的勞動，但却處於社會主義制度的軌道之外，財政政策對這些經濟，自然採取另外的態度。

落在擁有獨立收入的公民肩上的任何蘇維埃賦稅之基本原則，是不斷地企圖按照收入來課收；不言而喻的，所得稅的型形式，也應用於這些場合：當財收當局認為必須準確地從收入劃出一定的款項成爲完全可能的時候。這對鄉村生活條件，非常難以實現。那裏個人的收入量，採用實物的形式，而且那裏的納稅者，數以千百萬計。因此，在本場合應用初步所得稅的形式，並對收入的估計及課稅的方法，儘量簡化。集體農民，與單獨農民之個人收入，以及在鄉鎮中進行農村副業的其他公民（農學家，教師，鐵道上的常備職員，森林看守者等）之收入，則課以特種農業稅。

以前存在過的固定稅額制度，對一切被課農業稅的農戶，同樣地應用。此種稅額的差別，只依繫於經濟的區域，和納稅者的社會範疇而不同。現時法律指定每一農戶的個人收入，對個別共

和國，法律規定各種農產品及牲畜收入的平均標準；例如在蘇俄，每一公頃播種穀物的土地，課稅四十盧布，而栽種葡萄的，則課稅一百八十盧布，如此類推。徵稅機關的任務，是在於確定每一經濟現有條件，以及收入來源的規模。從確定收入的總數中，按照一定的累進稅率而征稅。

蘇聯的農業稅，充滿着各種的優待，保證經濟的進步，並減輕納稅者臨時可能的困難。

4. 消費性質的個人經濟

蘇聯的憲法包含特別的條文，指出蘇維埃的法律保護公民對其勞動收入和儲蓄，住宅及附屬的家庭經濟，家庭經濟的用具和日常用品，個人消費品和日用品之個人所有權，以及個人所有之繼承權。在城市中，特別是在城市型的小市鎮中，蘇聯公民擁有大量小房屋，這些小房屋的所有者，主要就是他們自己，而國家在其掌握中，則有較大的都市建築物之基地。法律賦予蘇聯公民利用其個人的貨幣儲蓄，建築自己的都市住宅及個人休息的郊外別墅之權。國家賦予這些建築者以若干的優待，和信用的幫助。

都市居民的個人收入，照例是他們在國家企業和機關工作或服務所得的工資。因此，工資的水準，是只依工資收入為生的壓倒多數都市居民福利水準之最重要的指標。

在估計蘇聯工資水準時，必須注意到在蘇聯的勞動者們獲得免費的醫藥幫助，兒女在托兒所及兒童園免費的教養，休養所和療養院等之免費的利用。

蘇聯憲法中所載的：『各盡所能，按勞取值』之社會主義的原則，成爲國家的工資政策之基礎。因此，國家企業的工人工資，不依繫於國家工業之某一部門，更不依繫於個別企業之財政狀況。因此，如果國家根據此種考慮，決定增加工業的某部門之工資，那末此種設施就在各部門的一切企業中實行，而與它們的平衡無關；但產業工資的規模，有力地依存於每一工作人員之幹才和毅力，因爲依據製成品平均標準而定的平均工資，是由超過工作定額及勞動素質之提高的獎勵加以補充。這一點可以解釋蘇聯財政制度中現有的個人所得稅，主要是落在工資上。驟然看去，好像工資收入的所得稅之徵課和征收，將單純地機械地，降低工資的規模。然而實際上，個人的工資，不是被規定的報酬之某種數字表單純的反映，而是工資取得者，個人活動所制約的，不變的數量。這完全地證明累進課徵之原則應用到此種個人收入範疇之所得稅中去之正確性。

蘇聯的工資基金，計達到十億盧布：一九三七年——八百二十二億盧布，一九四〇——一千二百五十億盧布；而個人的所得稅，在基本上，——但不無例外，——與此種基金相聯繫，在一九三七年計達十四億九千六百五十萬盧布，一九四〇年——三十六億七千七百三十萬盧布，提供

國家全部預算歲入的百分之二左右。但與都市和農鄉居民個人收入相聯繫的各種捐稅，在承年時期只佔國家預算很小的部份。例如一九四〇年它們提供預算九十四億盧布，或者整個預算歲入的百分之五又二。從純粹財政的觀點看來，在承平時期，個人捐稅此種微小的作用，是財政資源極為重要的後備之一。當環境要求國家將其財政處於非常緊張狀態的時候，此種後備實際上被利用了。

所得稅也課於工人，職員，文學家，藝術工作人員以及一般所謂自由職業的全體代表，手工業者以及居住城市並有收入之獨立來源的各種人物之個人收入。根據這次戰爭時期所頒佈的法律（一九四三年四月三十日）對所得稅之課徵規定下列的基礎：每月工資收入，不超出二百五十盧布者，無須繳稅。非合作化的技匠和手工業者之收入，以及房租收入每年不滿六百盧布者，均行免稅。由國家公債，儲蓄銀行存款，撫卹金，服公役者之貨幣所得以及蘇聯英雄和社會主義勞動英雄，斯大林文藝獎金之收入完全免稅。有三人以上靠其贍養者之稅額，減低百分之三十。

稅額是根據累進的原則，而建立起來的。在工資課稅時，每月收入在一千盧布以上者，以累進計算，而且稅率的徵收，是採用比例的方式。每月收入二百盧布者，所得稅徵收之規模為百分之二又五，四百盧布者——百分之四又五，以及一千盧布者——百分之八又二；收入總數超過一

千盧布者，課稅之規模爲百分之十三。

技匠和手工業者之收入，按照同樣的原則課稅，而且提高稅率百分之十。自由職業代表者之歲入規模達一千二百盧布者，其稅額與工人和職員相同；但收入在一千二百盧布以上者，則按較高的稅額徵收之。除了工人，職員以及與他們相等的人物之外，其他人物的收入，按照較大的職業課征所得稅，而且此種累進延續到每年收入在一千二百盧布的範圍之外。

個人收入對財政制度的給養之參加，不以剛剛說到的個人捐稅爲限；它也在國家公債及國家儲蓄銀行之存款中實現。從公債而來的財政結果，比從個人而來的財政結果要大得多。例如在第二次五年計劃年份內（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年），個人捐稅提供預算一百七十三億盧布，而在人民當中認購的公債，則提供一百八十一億盧布。在對德戰爭開始前的蘇維埃財政歷史全程中，蘇聯的勞動者們貸給他自己的國家五百億盧布，以及七十億盧布是由個人在儲蓄銀行中存款的剩餘。

在蘇維埃財政制度中，從國家信用而來的預算歲入之財政立場，是有重要的特點，以示區別。國家的公債，通常是在彌補預算之不足。在國家預算草案中，腐蝕的概念，對蘇維埃財政制度，是完全見外的；因爲此種草案，是在發展國民經濟的國家總計劃之基礎上而編製的。規定國家經濟以及財政活動的此種計劃，是建築在國家的物質和貨幣資源平衡的基礎上。依據金屬平衡

(需要性以及出品加上儲藏)依據燃料、木料、水泥等等之平衡的計劃，將財政制度特別重要的，的依據人民貨幣收入和支出。後面這種平衡，充分準確地決定動員人民資財，以實現經濟總計劃之任務的財政方法之效用的可能和界限。

建築在物質和貨幣平衡整個制度上的此種總計劃的其本身是整個國民經濟之平衡，並揭露出在計劃時期內國民收入之生產及共分配之整個圖景。在建立計劃之平衡方法的條件下，虧蝕是說不上的。蘇聯預算中之虧蝕，只作為執行預算之失敗結果，在理論上才成為可能；例如：在部分平衡中之錯算和錯誤，或者在編製預算草案時，其種非常難以預見的大規模的事變和天災(旱災)的結果。

整個蘇維埃的公債——有計劃的公債，它們是由國死經濟和財政計劃所預定。所以在國際聯盟所出版的概算表中登載的蘇聯預算，把它列入虧蝕的範疇，其罪過是在於這些概算表的作者們，簡直不了解蘇維埃財政制度的本質。

可以舉出一個統計的圖表，來描寫上面所說的這一點。

在第二次五年計劃年份內，蘇維埃國家向人民借入一百八十一億盧布的公債；同時取到儲蓄的、保險的和合作社組織的自由資源，達六十二億盧布，但轉交給這些組織以同樣數目的公債

票。因此，在五年內，總共舉借二百四十三億盧布的公債。在這五年內，執行預算的總結，計：歲入三千六百二十一億盧布，而歲出三千四百八十五億盧布。所以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年的預算，超過完成的數目爲一百三十六億盧布，其中某一部份，在國家預算草案中，曾經加以預定。

試問在此種條件之下，爲何又須舉借公債？

向儲蓄的、保險的和合作社的組織舉債，是因爲在它們那裏有自由的資財，對它們內部暫不需要；因此，把它們用到經濟戰綫的其他部份上去，是完全合宜的。這些公債，不是在社會狀況中，對國民收入分配，而在這個經濟中，業已蓄積起來的資源，在國家經濟各部門中之分配。

至於說到向人民的舉債，是在社會狀況中，國民收入分配的行爲；第一，它是財政制度補充資源之來源，而第二，是人民儲蓄的廣泛組織，依其結果來說，是恰當的經驗。這些公債的必要和規模，是從人民貨幣收入和支出平衡中，以及貨幣流通政策領域之任務內所得出的總結。預算歲入超過歲出，事實上，是意味着流通中貨幣量之減少，即是貨幣流通管理的因素之一。

更加有趣的另一個問題，是與人民中被認購公債相關聯的問題。爲什麼參加認購的蘇維埃公民，造成有利於此種公債的羣衆社會運動，並把這公債變爲全民的，羣衆的公債？

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應當注意到個人認購公債票的規模是不大的，認購的數目通常只合二、三個星期的工資，而且在許多場合，是一個月的工資。付出認購的數目，通常可以延長到十個月。此種制度對人民廣泛階層參加公債，創立了極爲順利的條件。結果千百萬人民把億兆盧布繳納到國庫中去。

有根據稱爲羣衆的、人民的第一次國家公債，吸收到自己方面來的認購者，數以百萬爲單位；例如一九二七年的公債，總數爲二億盧布，而吸收到自己方面來的認購者，達六百萬戶。但一九三七年的公債，參加公開認購者的數目，已超過五百萬人，反映到認購公債的總數目，由幾億變爲幾十億。

國家信用之擴大，從一九二七年起，開始特別顯著。這一事實可用許多原因來解釋。這些原因中，應當指出一點：這個時候，即是一九二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內戰之後，蘇聯國民經濟之復興已告完成。在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已經穩固地達到全國產力發展的革命前的水準。在社會主義改造及工業化的基礎上，整個經濟轉到進一步增長和發展的階段，開闢了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之新紀元。伴隨着都市不斷的增長，寬耕和深耕的種植之傳播，人民大眾政治上的重新教育，施行了依其內容和向來說說，都是很優越的，蘇維埃國家的民族政策，後者把蘇

聯山多民族組成爲統一的，和睦的家庭。國家公債之成功，在其最初的基礎上，是由對蘇聯憲法所載的蘇聯是「工農國家」的認識所規定的。日常生活的千萬事實，說明人民的基本大眾，被新生活的表現所包括。因此，人民福利的增長和政治覺悟性的發展，在蘇聯國家信用中，找到了明顯的一稱表現。採取大眾財政活動方式的公債，同時變爲愛國主義的顯示，變爲廣泛的社會運動。職工會以及其他社會機關成爲此種運動的領袖，它們在協助國家信用委員會的名稱之下而著聞。認購公債的技術方面，以及對公債票持券人之服務（利息的償付，還本，抽籤，公債票的保存），課在國家儲蓄銀行分歧交錯的網兒之上。

以二十年爲期而發行的蘇維埃公債，通常是採用兩種形式：付息的公債（後者在戰前時期——百分之四）以及無息而抽籤還本的公債，號碼很多，但獎金規模不大。

在承平時期，溫和地利用人民收入的個人課稅，以及廣泛地提出公債制度，爲籌措與法西斯主義作戰的經費，是蘇維埃國家財政戰鬥準備非常可靠和有利的成份。

但主要是在於蘇維埃財政制度之結構，在機體上與蘇聯經濟制度之根源結合起來。因此，財政制度準確地反映出國家收入的運動。因爲此種運動是有沒危機的，所以蘇聯的財政也沒有困難和故障地發展和增長起來，並且常常是成功的。

第二章 蘇聯國家制度與財政制度

1. 財政制度之統一

蘇聯國家財政制度真正的統一，具有極大的價值。這當事變要求國家緊張其一切財政力量的那些歷史時期，特別明顯地感覺得出來。在戰爭的條件中，財政制度之正確的，有組織的統一，是國家財政戰鬥準備的基石，也是順利地籌措戰費的保證。但蘇聯財政制度統一的生產，發展和鞏固，不是按照戰爭的動機，而且此種統一，對社會主義國家在承平時代的需要，並不亞於與法西斯主義作艱苦戰爭的條件之下。

新的國家，是在過去的廢墟上產生出來的。當時俄國在經濟上還不够發達，它曾被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的大戰，及在外國干涉夾雜其中的內戰弄到精疲力竭。在新國家的前面，提出復興破壞的國民經濟之巨大任務；最初的五年，完成了和平的創造勞動，而以後在新的政治原則以及新的技術基礎上，發展豐富的生產力。這些創造性的任務，把內容非常複雜的財政問題提到

第一項。爲着解決經濟的任務，只在國內尋找財政的資源，因爲根據當時的環境，外部的來源，是辦不到的。

因此，業已形成的環境，要求整個財政制度有組織的統一，使在聯邦制度條件之下的國家，容易做到財政資源以及按照國民經濟個別部門和偉大國家個別區域必要的，而不是龐腫的集中。

蘇維埃制度內部固有的國民經濟發展及經濟政策基本方向的計劃性，不啻預定經濟計劃的必要性，而且也預定此種計劃的統一性。計劃的過多，將是計劃單純的否定。

試查蘇聯憲法第十四條的內容，在我們面前明確地描繪出作爲國家——主人的新國家之式樣。基本法的這一條文，規定聯盟國家的權限。在其他重要任務中，第十四條指出，批准國民經濟計劃，統一國家預算以及構成聯盟國家，加盟共和國以及地方國家行政機關預算的賦稅和收入的權力，是屬於聯盟國家。在聯盟國家的其他職能之中，指出領導貨幣及信用制度，基於國家獨佔的對外貿易，管理銀行，工業和農村經濟企業，組織國家保險等等。另一方面，同一條文也指出給聯盟國家有可能計劃地調整處於聯盟國家管轄之外的國家支出部門的那些任務：例如，聯盟國家在教育、保健、勞動立法領域內確定基本原則的權利。

國民經濟發展計劃之統一，報導出蘇聯財政制度內部統一的實質特性，而聯盟國家，各共和

國以及地方新國家管理機關之間的國家管理分配職能（完成經濟管理的任務），也保證財政制度有組織的一統。

蘇維埃財政制度有組織的統一，在蘇聯國家預算中最明顯地表現出來。上面曾經指出，蘇維埃國家的預算，在其物質內容的關係上說，與其他國家的預算，有着重大的差別，因為蘇維埃國家的預算，包括國民經濟各部門累積的巨大部份。但又與其他預算，還有不同之點，就是它把各加盟共和國以及一切所謂地方預算都已包括在聯盟國家預算的概括平衡中，此種編製完整的蘇聯預算，提付蘇聯最高蘇維埃——全國最高立法機關批准。各種預算結合為聯盟的一個總預算，絕對不是單純的統計動作。第一，此種結合是某一年度的聯盟預算法的基礎；第二，從財政，政治的觀點來說，它是作為蘇聯總預算基礎的無數個別計劃現實性的鞏固保證。

實際上，蘇聯的總預算，不僅從形式，而且從組織方面，也代表出此種統一；因為它把借助預算方法積聚起來的全國國民收入的那一部份，也包括在自己的本身中去。蘇聯國家總預算草案之編製，沒有平衡的腐蝕，這意味着要求實現其財政資源的一切及全部計劃（無論是國民經濟的發展，或者的各種社會文化的設施等）的經費，必須獲得完全必要的數目。因此，蘇聯總預算有利了平衡，成為整個國家國民經濟計劃，以及國民經濟總計劃分解於其中的許多局部計劃最堅實

的保證之一。

蘇聯的財政資源，也如其整個財政制度一樣，根據政治原則分解為三個個別範圍：聯盟國家的財政，個別加盟共和國的財政，以及地方行政機關的財政，列在構成國民經濟發展國家年度計劃組織總和中的那些計劃，也分解為同樣的三個部份。例如，假使在任何個別共和國或區域範圍內，被認為正確和必要的計劃，不能由共和國的，或區域的財政資源來支付，那末，在把這些組織的財政計劃包括在蘇聯總預算中去的條件之下，其不足的資源，將賴聯盟的各種財政來源加以補充。作為蘇聯全部廣袤領土上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總計劃的統一中產生出來的邏輯結論看待的蘇維埃財政制統一的巨大價值，就在這裏。在艱苦戰爭試煉的年份內，那個時候，非常財政的努力，要求財政制度無論在集合全國資源的過程中，以及此種資源的支出中，都要提高其伸縮自如性和乘機應變性，那個時候，蘇聯財政制度所表現的統一的高貴品質，是不用說了。沒有任何懷疑，籌措三次巨大的五計劃經費之經驗，成為支付戰費的財政藝術的良好學校。

2. 蘇聯聯邦制度與財政制度

在組織關係上說，蘇聯財政制度的統一，在國家聯邦制度的三稜鏡中，被折射出來。此種折

射之所以容易，是對於蘇聯財政及其一切鍊環依據於同樣地建立在聯邦原則上的蘇聯經濟制度的緣故。如果作為聯盟國家看待的蘇聯之式樣，當作國家——主人的式樣描寫出來，那末構成蘇維埃聯盟的國家，也同樣準確地扮演同樣的角色出場。在聯盟領土上到處構成國家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國民經濟之基金，在聯盟國家及加盟共和國之間被分配着。在國民經濟一切部門中，伴隨着每年巨額投資的聯邦國家之奮勇的經濟活動，也在各加盟共和國的領土上湧現出來；因此，在沒有生產工具和手段私有制的條件之下，國家計劃的經濟部份之實現，歸結到各加盟共和國的發展。爲着每一加盟共和國的利益計——全力促進聯盟國家在其領土上的活動。這也歸結到聯邦原則在一切方面，其中也包括財政制度關係上協調的發展。

在聯邦的財政制度之下，曾經提出，並滿意地解決了三個巨大的任務：第一個任務，是儘可能合於目的地展開各個財政範圍之間（聯盟及各共和國）的個別收入來源。第二個任務，是在這些同樣範圍之間分配着完全處於聯盟國家政權管轄的一般來源之收入。以及最後第三個任務，——分配國家歲出的負擔。顯然的，第三個任務之解決，大半預決了頭兩個任務政策方向之決定。

在蘇聯的條件之下，財政的聯邦任務之解決，應當顧到如下的歷史事實：處於經濟發展非常不同水準的過去俄羅斯帝國之部份，也列入聯邦的成份中。帝國巨大的空間，例如在中央亞細

亞，事實上處於單純殖民地的狀況。俄羅斯中央政府，對於它們的發展，並不加以特別的努力，或者由於財政的不足，或且由於自己近視的民族政策的考慮。在這些條件中，當在這些區域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時，擺在面前的是需要大量的支出，然而收入來源却又貧乏。

此種情形大半預定了蘇聯財政制度的聯邦制度問題之解決。

在其他聯邦國家實踐中所試煉過的財政來源的分配方法，沒有很好的成果來證明其本身的正確。在那些國家中，聯盟與加盟共和國之間的來源之分配，並沒有把國家財政從中央集權制度中挽救出來；而且從另一方面，歸結到財政的競爭，歸結到「租稅的戰爭」。在個別的國家——聯邦成員之間發生經常的經濟戰爭；大家都爭取經濟的優勢，這同時削弱了它自己的結構，也削弱其他近鄰的加盟共和國的結構。一九三九年在美國出版的「論租稅特權」一書中對這個題目可以找到許多有趣的描寫。

一九三六年的蘇維埃憲法，否定在個別財政範圍分配收入來源之適宜。在本場合，它是站在整個財政制度統一的立場上，並確定「一切收入來源」不管它們是給養何種預算，都應當在一個中心——在蘇聯最高蘇維埃中得到批准。仗着關於來源問題的此種解決，把重心移到以充足資源保證各部門，自然，也及各區域資源的國民經濟計劃一切部份的問題領域中去。

關於蘇聯個別成員間收入分配所指出的決定，消除了這些收入經常和不變的劃分界限之必要。界線是移動的和變動的。在這種移動中的總傾向，是隨着財政資源的增長，以及與加盟共和國地方蘇維埃財政組織的鞏固，全聯盟資源的更大部份逐漸移到它們的手中去。

全聯盟資源分配實踐的研究，發現此種分配如下基本原則：

在分配聯盟國家政權所規定的來源之收入時，仔細地免除了計劃中的複雜性和混亂性。另一方面，分配從其許多附帶目的中，有一個目的是在使各共和國國家政權地方機關創立把一切及各種國家收入歸入它們領土中去的高度興趣；因為在某一共和國領土上所集收的這些來源之部份，歸入共和國或它的地方預支領配。這一去之特別重要，點是因為聯國家沒有它自己徵集收入的機關，而是利用共和國的所及主要是利用地方蘇維埃的財政機關。從聯盟收入中撥給共和國及地方蘇維埃動用的，有時達到頗大的規模。此種款項甚至於由聯盟從其公債中所得的數目撥付，此種公債不作爲非常的來源看待，而是與其他財政來源——這盡其功能。例如從一九四〇年的公債中（九十億盧布）劃出從城市居民方面所得的部份百分之五十歸入各加盟共和國的預算中去，同時使它們把此種收入的半數移到地方蘇維埃的預算中去；在農村居民認購的公債總數中曾經撥百分之九十移交給鄉村地方蘇維埃支配。不言而喻的，在這些條件之下，共和國的和地方的財政機

關，對廣泛地宣傳和認購公債感到極大的興趣。

最後，構成蘇聯預算制度的個別預算間收入分配的第三個原則，是以隨着國民收入任一來源之增長而增加起來的經常收入給預算以高度的保證，經常的收入，不僅是那種完全歸入特定來源預算的某種範疇支配之收入。經常的收入，也是從給養各種不同範疇，例如聯盟的和共和國的來源每年所劃出的一定百分數之收入。

可以說，預算收入的一切基本來源，除了少數例外，對各財政範圍是共同的來源；只歸入聯盟預算的關稅和拖拉機站的收入，以及只歸入地方預算中去的所謂地方稅（對建築公共地段的費用，以及娛樂捐等等）的收入，構成例外。

下列一表提供聯盟預算和各加盟共和國預算——地方預算也包括在內——之間的國家預算歲入的圖景（以十億盧布為單位，一九四〇年）：

	聯盟預算	各共和國預算	總數
一、週轉稅	九五，六	一〇，三	一〇五，九
二、利潤所得	一二，八	八，九	二一，七

三、機器拖拉機站	一，〇	一，〇	二，〇
四、所得稅（人民所付）	一，九	七，五	九，四
五、地方稅	—	一，九	一，九
六、國家公債	六，二	五，三	一一，五
七、合作社組織所得稅 及非商品活動稅	〇，二	三，〇	三，二
八、社會保險基金	六，六	二，〇	八，六
九、關稅	二，九	—	二，九
十、其他收入	八，七	四，四	一三，一
總收入	一三五，九	四四，三	一八〇，二

在表式中應當注意到人民所付的捐稅（第四項）大部份被移交給各共和國的預算（主要是地方的），以及各共和國的預算獲得參加國營企業利潤的極大部份。收益最豐的工業部門——輕工業和食品工業，是在共和國的管轄之內。所規定的價格水準，非常接近產品成本的生產工具之生產工業，是集中在聯盟的管轄之內。

作為全國工業化基礎而集中於聯盟的巨大重工業，是預算收入最大部份在聯盟預算中集合的主要原因之一。

下表（以十億盧布為單位，一九四〇年）示出蘇聯國家預算歲出的基本劃分：

歲出	聯盟	共和國及地方蘇維埃	總數
一、國民經濟	四九，九	八，四	五八，三
二、社會文化需要	一二，九	二八，〇	四〇，九
三、國防	五六，八	—	五六，八
四、國債	二，八	—	二，八
五、其他支出	九，八	五，七	一五，五
總數	一三二，二	四二，一	一七四，三

表式指明國民經濟經費之壓倒部份，主要就是重工業，運輸以及機器拖拉站的經費，是集中在聯盟預算部份，如果把列在聯盟預算部份的國防支出（五百六十八億盧布）也加到此種支出中

去（四百九十九億盧布），那麼，只這兩種支出的總數，就是把愈益提高的聯盟收入蓋在各加盟共和國及地方蘇維埃的收入之上而有餘。根據一九四四年蘇聯最高蘇維埃的議決，曾經決定「各聯盟共和國籌措共和國軍隊之費用。」這喚起各加盟共和國預算中國防支出的出現，結果將倚靠聯盟歲入總數的分配，而增加它們收入的資源。

在各共和國及地方的預算總數中，應當注意人民的社會文化需要支出之優勢（佔全部支出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這些支出的此種顯著地位，是因為所說的是那些文化教育性質的大批實施和組織，例如人民的醫藥服裝，義務的普及教育等等。

根據聯盟的憲法，蘇聯的總預算，每年由聯盟最高蘇維埃加以批准，後者同時批准總預算的聯盟部份。預算的聯盟部份，是按照歲入和歲出的詳細劃分，加以批准。總預算則按照屬於共和國和地方蘇維埃的預算之個別部份的概算，加以批准，在這種預定審核預算制度個別鍊環間之收入的總預算基礎上，加盟共和國的最高蘇維埃在其詳細的一致中，審核並批准其國家的預算，以及規定透過它們而被送到地方預算中去的收入部份。領導地方經濟和文化建設的地方蘇維埃（邊區的，省的，州的，區的，都市及農村的）自己確定「地方的預算」（憲法第九十七條）。

聯盟及加盟共和國最高政權機關預算權的基本內容，是批准實現發展國民經濟國家計劃的財

政計劃，並檢核它們的執行；換言之，即是最高的領導。透過財政來領導國家的經濟活動，內容沒有包含對蘇維埃政權立法機關職權任何限制的蘇維埃預算法的廣泛民主性之最重要及最顯著的特徵，就在這裏。

因此，在立法院中預算演說的通常內容，是評價已達到的經濟和文化的效果，剖析局部失敗的原因，評價未來的計劃，監督完成整個聯盟以及個別加盟共和國國民經濟計劃的執行機關和個人。

在包含純粹經濟建設，可及提高文化和生活水準措施的聯盟和加盟共和國之國民經濟計劃中，實行蘇維埃內政的基本路線之一，——是儘量促進經濟文化關係上較爲落後的加盟共和國更迅速發展。這個路線是國境內居住着一百零二種民族的蘇聯民族政策的重要特徵。

蘇維埃政權的民族政策，在純粹財政範圍內，也找到它自己對共和國的和地方的以及在沙皇專制時代曾被輕視的那些區域預算增長速度提高的反映。

作爲描寫，可以舉出幾個最顯著的數字。在第二次五年計劃年份內（一九三三——一九三七）蘇聯整個國家預算增長百分之一百六十四又一，預算的聯盟部份，增長百分之一百三十八，而共和國及地方的預算，則增長百分之二百五十九。（資料來源：蘇聯統計局，一九三七年，第10頁）

分數，還要大些：吉爾吉斯共和國增長百分之三百六十七又七，哈薩克共和國增長百分之四百零五又一，如此類推。

共和國預算在其基礎上高度的增長，是由直接依存於共和國及地方收入增長之外的支出較高度的增長來決定的；因此，很自然地，在共和國的預算中，特別是在最落後的共和國預算中，聯盟的預算制度把被包括在蘇聯國家預算總平衡內扮演一切預算平衡之調整者作用的那些收入來源中撥出最大的經費。依其規模來說，最重要的是如聯盟週轉稅那種具有調整作用的來源。一九四一年，由此種來源撥出百分之五又三到蘇俄的預算中去，撥出百分之五十七又三到吉爾吉斯共和國預算中去，撥百分之四十五又三到哈薩克共和國的預算中去，如此類推。此項稅款的總數，是在它們的領土上徵集來的。

甚至在戰時的條件之下，蘇聯對各民族共和國的預算政策也沒有改變。一九四四年，蘇聯預算按照計劃比前一年增高百分之十七又一。但如吉爾吉斯共和國，哈薩克共和國等，這些共和國的預算在一九四四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又一——百分之二十八又五，如此類推。

把法西斯主義者從蘇維埃領土上最終清洗出去之後，一九四五年蘇聯的國家預算，把自己的概一切加盟共和國，即是在戰爭開始時曾被敵人佔領和蹂躪的那些共和國包括在自己預算平衡的概

算中去。在把預算恢復到這樣完整的條件之下，蘇維埃預算政策的基本傾向，以特殊的力量表現出來。一九四五年蘇聯預算的總平衡，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六又一；同一時期，各加盟共和國的預算，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此種現象有兩個原因：第一，在勝利年的預算中，在戰費支出之後，在基本支出中，社會文化需要的經費佔了第一位。這些經費在基本上包括各共和國的以及與它們密切聯繫的地方預算在內。這些支出巨大的上升（一九四〇年四百零九億盧布，以及一九四五年六百六十億盧布）激劇地增加了上述各種預算的規模。第二，完全可以明白的原因。是領土曾被暫時佔領的那些共和國的預算，非常有力地增長起來，它們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二。這個事實，是蘇維埃財政之統一，以及聯邦財政問題領域內賢明決定的巨大政治經濟意義之新證明。

蘇維埃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及它以後的財政政策，帶來了它自己有價值的結果。我們不用說聯盟各民族在與法西斯主義作戰時已表現出自己的一致團結，環繞於蘇維埃國家旗幟的週圍；而各民族在蘇維埃戰士，在與危險敵人搏鬥時，以空前未有的光榮，蓋滿自己。對地理面積來說極其廣大的東部邊陲的各共和國經濟和文化加速增長之有計劃的促進，表現出非常之有利。戰時蘇維埃國家政權，能够在準備好的基礎上，迅速地安排，並以勞動力保證從全國西部各區撤退出來的軍需工業企業，並強化對此種工業必需的原料，材料和燃料之開採及加工。這一切在第一次世

界大戰時的俄國，是不可想像的。蘇維埃國家的民族政策的成果之一，是鞏固和行動的經濟後方之獲得發展，而這是勝利的決定條件之一。

3. 財政制度中之民主原則

蘇維埃國家的法律，不知道通常應用於地方行政組織的法學上的術語——「自治」。蘇維埃的憲法，說到「國家政權的地方機關」；而這些「地方機關」，是民主思想真正的表現，是自治的真理原則明顯的表現。

蘇維埃國家的創立者和組織者——列寧說過，蘇維埃國家對工農是高度的民主。當描寫蘇聯社會制度時，在斯大林的憲法中說過：「勞動者代表蘇維埃，構成蘇聯的政治基礎」，即是由根據普選法被選到那裏去的人們構成的蘇維埃。選舉出來的蘇聯最高蘇維埃，是國家政權的最高機關。也如聯盟及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之代表在同一程序中選舉出來的勞動者代表地方蘇維埃，是國家政權的地方機關。因此，在蘇聯的一切行政從上到下，都建立在同一的自治原則上。在蘇維埃制度中，地方自治的思想，不僅沒有與地方的國家管理之思想相對立，而且邏輯上補充它，並與它融匯貫通起來。

國家行政組織中的二元論，對各方面體現出自治原則的蘇維埃國家，是完全不屬同類的。

從這裏產生出對財政制度具有巨大影響的一個後果。在高度體現民主的國家中，在各種不同財政範圍間，不會有衝突。如所深知，例如在舊俄的地方財政歷史中，就非常富於有種衝突。現有的總計劃，消除此種衝突的可能。吸收全體勞動人民到管理國家的工作中去，是蘇聯整個內政的基本任務。這個任務之解決，自然集中於勞動者地方蘇維埃的活動，其周圍常為對政治及經濟生活最積極地感到興趣，並力圖在其日常工作中，幫助自己蘇維埃的那部份選民所環繞。

地方蘇維埃逐漸地積累了更多的經驗，並使自己成爲更能負起管理國家較複雜的功能和一般的任務，特別是經濟的。蘇維埃國家是作爲複雜的歷史過程的結果而形成的。同一的歷史過程，改造了並在政治上重新教育了工人和農民，後者在幾世紀中以及直到比較不久之前，對國家的管理，完全被剝奪了任何的參加。蘇聯的人民大眾，在經驗中學會了管理國事，此種經驗在其內容上逐漸豐富起來，並使千百萬新國家的建設者富於此種經驗。

國家政權的地方機關制度，隨着經驗和知識的此種豐富而擴大並鞏固起來。地方蘇維埃在邊區，省，自治省，府，區，城市，鄉鎮，農村以及高加索的山民村落與烏克蘭的草原村落中確立起來，擴大了它們功能的範圍，以及它們權限的容積。

這些組織的歷史，說明地方管理功能不斷的擴充，以及賦予它的任務範圍之增加。在許多年中，把數量日益增長的機關，企業，財產，以及以前由各加盟共和國的中心機關所實行的措施，都交給地方預算。

自然，在依其規模巨大的國家經濟之現有條件下，國家行政的地方機關，被經濟的功能有力地充滿了。指出一點就夠：城市蘇維埃在城市中進行一切公用經濟，由新建築不斷地充實地來的住宅基地，也包括在內。在鄉村蘇維埃中，經濟上所關心的農村公用經濟，由集體農場組織之需要的服務充實，以及其他。

地方國家行政機關職權的另一領域，有如廣闊的大海，這就是對人民的社會文化需要服務的領域。在這裏，地方機關是提高人民文化水準和保健計劃的主人及主要執行者。

最後，地方機關在政府領域內，是担任十分負責的任務：因為付託它徵收全國的收入以供聯盟預算，加盟共和國預算和它自己地方預算的複雜事情。

這一切合在一起，歸結到地方預算無論現在或將來都將不斷地增長起來，在其增長的速度中，趕上聯盟及加盟共和國預算的增加。

最近幾年來，地方預算發展的道路，可由下舉統計材料指出其容量（以十億盧布為單位）：

一九三二年	五，九
一九三三年	六，八
一九三四年	九，〇
一九三五年	一三，三
一九三六年	一八，六
一九三七年	二二，〇
一九三八年	二六，三
一九三九年	二八，一
一九四〇年	三〇，五

爲着描寫地方預算收入部份的特徵，可以指出，例如在一九三五年一百三十三億盧布收入總數中，有四十四億盧布，是從經常的地方來源（經濟的，以及人民捐稅的收入）而獲得的，八十九億盧布，是從聯盟的，以及共和國的預算中移交來的。一九四四年，地方預算收入的總數，計

達三百零五億盧布，其中一百四十八億盧布，是從經常的來源，以及一百五十七億盧布，是從聯盟的，以及共和國的預算得來的。

上舉的事實，指明地方蘇維埃活動的擴大，是與它們經常收入絕對無關，並表明蘇維埃的財政制度，奮勇地贊助地方行政機關的增長和發展。

一九四〇年，地方蘇維埃如下地支出共三百零五億盧布：五十億盧布用於國民經濟，二百一十二億盧布用於社會文化設施，以及四十三億盧布用於行政及其他需要。

戰時地方蘇維埃以及各種各樣形式的活動，包括到英勇前線服務的全民運動中去。它們在解放區中，對復興地方經濟及文化機關進行巨大的工作：因為現代的野蠻人——法西斯主義者，首先有系統地破壞與文化工作相關聯的一切建築物。

第三章 財政管理

蘇聯的財政制度，不僅把國家預算，而且也把預算的整個體系包括到自己的懷抱中去。蘇聯的預算，是蘇聯財政的基本部份。作為短期信用的唯一機關，以及包括預算在內的國家經濟之唯一出納的國家銀行之銀行信用組織，是此種制度的第二部份。國家銀行是信用的唯一機關，這不僅是因為沒有其他短期信用銀行和它競爭，而且也因為國家企業沒有權力賦予它自家的顧客以期望的商業信用的緣故。國家企業出品的買者及賣者，在其必要的場合，可在國家銀行獲得信用。此種原則，也通用於社會主義經濟合作部份的企業之間，作為出納服務及短期信用之組織者看待的國家銀行之地位，把它變為貨幣流通的基本調整者。

國家經濟各部門的財政，是蘇維埃財政的第三個組織部門。代表許多具有自己個別平衡之獨立企業的每一經濟部門，在銀行中有其帳戶，並且在這個銀行中取得信用的權利。從其他產品劃出一部份，並由銀行信用以及不必歸還的預算經費來滋養，並以此補充它自己的週轉金和所投資

的各部門之財政，在其總和中，是非常龐大的。在繳納預算中的週轉稅和計劃所規定的利潤部份之後，各部門的財政，用以增加週轉金，用於基本建設，以及用以改進本部門勞動者的文化生活條件。在各部門財政關係中作用着的通例，是：自己的累積，是支付企業需要的第一源泉，而預算是補充的源泉。國家銀行在基本上只當企業因季節性擴大之需要週轉金，以及文件尚在途程的場合，才提供信用。

國家社會保險的財政，是財政制度的第四個部份。社會保險的預算，不久以前被列入國家總預算中去；在組織上，它是處於職工聯合會的管理之中，國家義務的和自願的各種保險，也應當列入這類中去。

最後，合作社和集體農場的財政，也必須包括平蘇聯的財政制度中去；因為在組織關係上，它們的財政雖佔有完全獨立的地位，可是：第一，在它的功能中，與一切其他財政機構相聯繫，而第二，在為實現發展國民經濟的國家總計劃所必需的一切財政資源之概算時，必須採用計算。

整個財政制度之聯合和指導的管理，是握在聯盟的部長會議手裏，而在各共和國，則是握在各共和國的部長會議手裏。財政的行政管理，則握在聯盟及各共和國的財政部手裏；但這些都會的作用，是限於預算的範圍，以及對整個財政制度執行職權的監督。聯盟的財政部，是國家預算

聯盟部份的執行者，而對其餘的，它只完成領導和監督機關的功能。因為透過預算，有巨大投資加入國民經濟中去，那麼為着遵守此種程序，蘇聯的財政部在此種非常重要的領域內，有許多專門的機構，透過後者，把預算的資財轉交給企業，並監督它們的用途。這些機構，是按照為基本劃分的企業（工業、農村經濟、貿易、公用經濟）之長期銀行的型式而建立的。儲蓄銀行，也在同一的部會管轄中。

國家銀行獨立地管理，而它的主席也如財政部長一樣，構成部長會議之一員。

由國營企業代表出來的國民經濟個別部門之財政，是由相當部門的部會加以管理。

合作社企業的財政，是由相當的合作社中央管理之。集體農場的財政，是由每一集體農場它們自己所選舉出來的管理處管理之。

但對社會主義國家及其經濟之財政管理問題，使人感到興趣的，不僅是此種管理組織的外部組織結構；感到興趣的，而且也是內部的。管理組織建立於其上的所謂基礎，只在現有此種基礎的條件之下，才能順利地管理；也只在此種場合中，管理才能完全地掌握管理的對象。海浪是不能管理的，但蒸汽和電氣的巨大力量，無需特別的費勁，而可加以管理。

截至此刻為止，科學還沒有具備「財政」概念的完全令人滿意的定義。這，自然，有力地妨

礙財政理論的發展，但有一點是無疑的，在任何現代國家的財政概念中，必須加入財政的兩個重要標誌：第一，這是財政對國民收入分配的直接關係。在此種分配過程之外，沒有財政。現代的軍事財政，非常觸目地對一切及每個人顯示出財政在國民收入中的意義。第二，如一般通例，財政永遠穿着貨幣的外衣，而且在商品貨幣關係之外，沒有它的地位。因此，財政的管理與貨幣制度的管理，直接相聯繫。

蘇維埃的財政，還有一個重要的標誌。此種標誌，包含在蘇維埃的財政，不僅倚靠於國民收入的分配，而且也倚靠此種收入最大部份的生產。如上面所已指出的，蘇維埃財政資源的基本量，是從國家企業直接而來；因此，免除了國民收入分配的階段。蘇聯財政制度本身分配的那種基礎，已是經濟的貨幣積累，即是國民收入分配的成果。在其他國家中，國民經濟的積累，不是集合在預算之中，而是集合在預算之外。只有透過國家的信用，預算才能接近此種積累。在蘇聯的條件之中，國家的信用，朝向消費者的收入。在蘇聯，沒有貨幣資本和借貸資本，而且依照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來說，借貸資本的構成，把貨幣變為貨幣資本，是被排斥的。貨幣只在某種場合，作為勞動的積蓄而發揮其功用，——此種積蓄是放在儲蓄銀行，或採取國家公債票的形式，或作為家庭的保管庫，是沒有差別的。

在管理財政的角度之下，觀察了上面所指出的蘇維埃財政的三個重要標誌之後，我們看到一切這些標誌說明蘇聯財政關係的基礎，本身完全是受着國家及其機關所管理。此種情形，使財政制度的組織及其管理之任務，太大地容易。

實際上，國家財政資源構成中最負責的契機——國民收入的分配，——是國家經濟計劃重大的客體。這特別是把國民收入分配到擴大再生產領域，以及直接消費領域中去的那一部份之基本任務。在解決此種任務時，計劃統治着，如二十年來的經驗所指出，計劃沒有阻礙和複雜的困難而告完成。

蘇聯的財政，與工業，農村經濟（國營的大農業企業——國營農場）以及運輸領域內國營企業的國民收入之生產，發生直接的聯繫，也如倚靠生產的準確和詳細計劃，以及國營企業的財政聯繫之計劃與預算發生直接的聯繫一樣。生產是在計劃所規定的數量及產品種類的條件中工作着，同時由計劃批准其生產的成本，按照計劃所批准的價格，脫售其產品。因此，經濟的積累，也由計劃所預定，在後者的基礎上，規定國家歲入預算中的基本立場，一切這些結合在一起，使每年吸收國民收入一大半到自己懷抱中去，作為財政來源和機構之組織看待的財政和財政制度管理的複雜任務，重大地減輕了。

財政資源的貨幣外衣，同樣是計劃機械的代理人；因為貨幣成爲一般經濟政策的武器，而且在此種負責範圍之內，從自發的法則統治之下解放出來的貨幣流通，是從計劃方面來的被隸屬的影響。

兩個巨大的事實，規定蘇聯貨幣流通之基本狀態和任務：第一個事實，是由國營企業和組織所生產的商品和日用品的巨大數量，在流通中與貨幣量相對立。計劃的任務，是在測量貨幣量和商品量的運動。此種任務解決之所以容易，是由於商品及日用品依其實現的價格，以固定不變爲特徵，而且比遠是由計劃所規定的。由於第二個事實，指出一點就夠，在這次戰爭時，廣泛消費和需要的物品，例如麵包，肉類及食鹽等等的價格，依然沒有提高。曾經提高價格的商品，絕對不是必需的消費品，例如酒精飲料和煙草。

在價格政策中，計劃的一切基本經濟和政治任務交錯起來。價格政策，在根據工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中樂觀的相互關係之可能性而規定的，這幫助兩個同盟階級——產業工人和集體農民利益正確的相互關係之政治任務的解決。價格政策預決了國民收入分配的路線，並以此使擺在財政制度面前的任務減輕了。在其他條件之下，國民收入的分配，是對流及反流互相交錯的複雜的網兒。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此種分配前面，具有模型，後者是在年度經濟計劃中，被描寫出來，這

提供財政計劃以根據性，確證性和實在性。

財政計劃的實在性，是對抗例如從預算方面來的——這是歷史地形成的通貨膨脹現象和罪惡的源泉——加於貨幣流通的威脅之保證。

蘇維埃貨幣的對外通貨之立場，有其對外貿易獨佔之鞏固性作保證。後者提供國家一切可能在應有的程序中維持對外貿易的平衡。蘇維埃政權各機關準確地履行在對外經濟及財政關係範圍內所發生的責任。在對外貿易平衡中，現在有的有利結算中，在作為「世界貨幣」源泉的黃金之日益增加的生產中，這一切併合在一起，成為蘇維埃貨幣對外通立場鞏固性的保證。

按照計劃的貨幣流通之管理，不僅意味着保證貨幣單位穩定性的經濟政策之意圖。如所周知，此種穩定性，當時在許多國家中，舊俄也在其內，十分滿意地被解決了。黃金的通貨實行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大戰之前。在社會主義條件中，貨幣的管理，其目的是在把貨幣作為達到國家計劃某種目的之有價值的武器看待，為經濟而服務。此種意圖，邏輯上假定貨幣流轉本身應當成為計劃和管理的讓步的對象。只有在此種條件之下，貨幣流通不馴服的自發性才被戰勝。

一種重要的情形，幫助了戰勝此種自發性，並使蘇維埃的貨幣成為計劃的奴僕。此種情形就是社會化的經濟，成為人民貨幣收入之基本的，而且在多數場合是唯一的源泉。這在非農業人民

的收入關係上說，特別正確。後者的收入，是從工資基金中流注出來的，這對現時業已聯結為集體農場的農工人民來說，也是正確的。人民貨幣收入來源的社會化，意味着從這些來源出的計劃化的組織，成為對國家完全可以接近的東西。這些來源在組織上處於國家銀行的管轄之中，後者根據政府所批准的特種出納計劃，進行它自己儲蓄的服務。銀行的巨大計劃，不僅規定在工資以及集體農場所付出的農業商品形式中的，從中央流到周圍去的貨幣洪流的那一部份，而且也規定在相向的貨幣部份。國家及合作社零售貿易的全部商業收入，以及繳納到預算中去的資財，每日每時流到儲蓄銀行中去。貨幣量的兩個基本支流——離心的及向心的——之平衡，是握在國家手裏，後者擁有商品的基本量和價格的槓桿。貨幣單位商品負荷的指標，即是被賣出的商品量被分為流通中的貨幣數目，成為貨幣流通領域中設施測量的良好的和觸目的標準。除了經常地通過國家銀行出納處的貨幣流轉範圍之外，還留着發生於農業型居民地的——那裏存在着在農舍附近地段上的個體生產的極為渺小的經濟等等，——內部交換範圍內的流轉，以及在城市中所謂集體農場的市場上，——那裏價格不由國家來規定，——的流轉。但這些經濟標準的比重，要影響貨幣流通的其餘部份還是太小。最後，貨幣的某種部份，由人民私藏起來；除此之外，對人民成為日常用的。但因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排除了把私藏的貨幣變為貨幣資本的可能，那末從計劃

的觀點看來，被私藏的貨幣，大半是中立化的。自然，它們在規定商品流通及日用品之需要規模時，是被計算到的。

因此，對財政的貨幣外衣之滿意狀態感到興趣的財政管理，是由在所希望的方向給此種外衣以影響的各種方法之充份的武器庫武裝起來。

第四章 國家銀行

蘇聯現代銀行和貨幣機構之基礎，是奠立於一九二一年底，當時曾經組織擁有自己銀行券發行權的蘇聯國家銀行，在同一時候頒佈的特別法，新的發行銀行曾被賦予取得國內的和出口的金，以及其他通貨金屬和外國通貨之獨佔權。

在一九二四年獲得最後完成的全國貨幣改革之施行的開端，成爲了銀行的基礎；那個時候，以較大有價證券（低於十盧布）補充銀行券，對於小的有價國庫券，也會加以規定。這兩種貨幣形式各自按照其比率，相互自由交換，並具有法定的支付手段之效力，以律全國的貨幣流通，最終地鞏固起來了。國家銀行在清償全部發行時，在遵守其法規要求的條件之下，把一切國庫貨幣置於自己的平衡中。因此，銀行是通貨準備的唯一保管者，和貨幣流通整個體系的負責調劑者。

在完全程序中的貨幣流通之實行，使能着手短期及長期信用最合宜的組織。短期信用的組織，是最重要的任務；因爲生產過程的正常化，以及貨幣流通大半的穩定，都依繫於這個任務之解

決。

在其存在的最初十年中，除了爲服務經濟的個別大部門而創立的其他較小銀行之外，國家銀行給經濟以信用。另一方面，除了銀行信用之外，還有由某企業提供個別企業的期票信用。此種信用制度妨礙了作爲有力管制提供信用的企業活動之工具的銀行信用之利用。

因此，在三十年代之初，就開始了信用制度的重建。兩個原則奠定了此種重建的基礎：（一）需要信用的每一企業，只能在一個地方——國家銀行獲得短期信用；（二）期票的信用曾被禁止；因此，任何一個企業，無權給予其他企業以信用。這樣一來，國家銀行是銀行直接信用的唯一來源，並與大批企業發生直接關係。其他各銀行則被變爲長期信用的銀行。

同時對組織企業的週轉金，曾經進行了巨大的工作。此種工作給銀行信用以經濟的界限。每一企業獲得完成生產綱領所必需的週轉金之一定數目，由它自己管理和支配。屬於企業的週轉金，或由國家預算賦予之，或由自己利潤構成之，或者同時由兩種來源獲得之。隨着生產綱領之發展，倚靠這些來源進行自己週轉金進一步的增加。

從這裏可以明白，銀行信用對週轉金之基本量，是沒有關係的。

但賦予企業自己的週轉金，依然留供企業生活中的許多需要，如果這些需要不能用自己的資

財來付償，以及按照事情的本質，不應倚靠其資財來支付的話。屬於這類的，首先是企業對生產季節過程之支出，以及對原料、材料、燃料等季節儲備的累積。這些帶有臨時性質的生產支出之突然的擴大，是由銀行的信用加以償付。此種方法可以避免曾經有過的大部份週轉金呆滯的可能，如果賦予企業自己的週轉金，是在季節需要的最高水準之上。

除了季節的需要而增加的週轉金之外，在下列各場合，也賦予企業以銀行的信用：當它們的出廠物品，送到定貨人或消費者那裏去，而尚未獲得相當的貨幣等價物補償的時候，貨幣證件在某些時候尚處於途程之中。在流通過程中，企業週轉金之此種暫時的延擱，概由國家銀行信用完全填補之。

最後，在下列各種場合：當背離生產計劃的結果，——在這個基礎上規定自己週轉金的水準，——或因獨特的情形（運輸的困難），在企業方面發生週轉金之不足，如果對計劃的背離，是由企業的不良工作所引起，那麼此種場合，銀行拒絕增加信用，而企業的財政困難且將成爲國家政權的相當法庭審判的對象。因爲銀行信用的提供，是根據債務者的財政和經濟的狀況分析而進行的。這樣一來，銀行信用成爲國家管制企業活動的最嚴正的形式之一。

但有許多經濟部門，在其生產過程中，或者完全沒有季節的搖動，或者受到季節性的影響至

爲輕微。這種事實，把它們置於銀行的管制之外。爲要把銀行的管制也通行到這些往往極爲重要的部門，例如機器製造業中去，不久以前曾經有過此種非季節性部門週轉金新組織的經驗。此種新組織，包括銀行必須在一定份額內參加它們的週轉金之構成。在某種企業需要的情形之下，它就利用銀行賦予它的那一份週轉金，而它自然地會投入銀行的管制之下。

銀行提供信用的條件，與一般的形式差得太遠，而且是由對某一經濟部門一切特點的估計來決定。

國家銀行每年提供經濟千百萬盧布。經濟本身暫時的自由資源，流入作爲整個經濟的統一核算中心的銀行中去，成爲信用的基本源泉。每一機關以及每一企業，必須在銀行中保有其現金，除了極少數目之外，一切核算必須在銀行來進行；因此，銀行的帳目，由常常剩有巨額的，未被動用的大批貨幣資財所充實。在這些核算中，足以顯其經濟本質的特徵的，是：它們由企業和機關的儲蓄準備金所充實了。

銀行資源的主要來源，如儲蓄的準備，以及經濟的一般貨幣準備，是由預算的經費以及自己的利潤所構成的銀行本身之資財所補充；這些利潤一部份列入預算中去，以及一部份則留在銀行的平衡中。

也如一切具有發行權的銀行一樣，蘇聯國家銀行的資源，是由發行的源泉來充實。與貨幣經濟之增長相關的發行收入，不僅由經濟的信用計劃所規定，而且也由國家的儲蓄計劃所規定。在儲蓄計劃中表明現金流轉——主要是根據零售商品流轉的路線、以及工資、捐稅、儲蓄等基金之動態；從這裏就產生出貨幣流通政策指令性的總結。貨幣額或者增加起來，或者依然穩定，或者減少下去。國家銀行的信用計劃，作為儲蓄計劃的平衡如不足够，那麼作為供給社會主義經濟經費基本源泉之預算，出來償付。

正確編製儲蓄計劃，並加以完成的責任，是落在國家銀行的身上；因此，後者成為國內貨幣流通之調劑者和守衛者而出場。

關於蘇維埃貨幣單位的對外通貨立場之關心，是由禁止蘇聯貨幣輸出國外以及它們輸入蘇聯的一九二六年及一九二八年的各種法律所簡化。從一九三八年起，根據此種固定市價，曾經確定比率：一美元等於五個盧布三十戈比。這些固定市價主要是應用於對外貿易活動的內部核算，以及應用於這些場合：當獲得外國商品，例如機器的蘇維埃企業，應當把所得的蘇維埃通貨記入自己的帳簿中法。在與外國訂立各種條約時，照例把蘇聯的一切對外貿易活動在國外通貨中進行。對外全部通貨流轉都集中在國家銀行。國家銀行透過它自己的通訊員，用外國通貨與國外顧客進

行核算，而同一銀行。則用蘇維埃的通貨，按照固定市價，與它自己蘇維埃的顧客，實現對外貿易獨佔的組織，進行核算。

③

第五章 蘇聯英勇的承平時時代與財政

1.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大戰後國民經濟的復興

在與法西斯匪羣作鬥爭中，蘇聯軍隊所表現出的那種果敢和技巧，那樣驚人的堅定和不倦，在全世界引起了驚奇和頌揚。這些卓絕的軍隊，是從勞動的蘇維埃人民懷抱中產生出來，後者給它自己勝利的軍隊以穀物和武器，而且有權與它們的軍隊分享燦爛的光榮。

在蘇德戰線上的事變進程，對蘇聯的敵人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他們期待着完全另外的圖景，而這就暴露了它自己對時間上說來非常短促，而內容則又非常豐富的蘇維埃國家，蘇維埃人民，及其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戰前時間之絕對不了解與無知。與法西斯主義開戰前的一世紀的四分之一時間中，對蘇聯是平常的日子，充滿着人民大眾的巨大的創造性工作，和偉大的成果，而這些平常的日子，毫不誇張，和不強辯奪理地可以稱爲英勇的日子。這些日子的全部歷史。還未被記述出來，但將來的歷史家不能越過此種推動勞動大眾走向創立新國家和新經濟道路上的奮發和

真正的感召。蘇維埃國家的創造者——列寧，當在全國已出現了創造性工作若干條件的一九二〇年之某一次發言中，說到社會的各勞動階級在它們爲自己的自由而奮鬥中空前的自我犧牲精神，採取空前的規模和形式，當對蘇聯歷史一點也不了解的希特勒，把他自己的軍隊，自己仔細地準備好的全部軍事機構向蘇維埃的土地推進的時候……。

國家生活中的大小事件，都在財政制度一定參加的條件之下來完成。因此，充滿着組織設施，尋找樂觀方法解決當前財政任務的蘇維埃財政史，帶給自己英勇時日的反思。

現時是在擊潰法西斯主義之後，當全面地復興國民經濟的複雜問題提到日程之前的時候，適當和及時地回憶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大戰之後，以及由於外國干涉而極端複雜起來的內戰之後，蘇聯所經歷的復興時期。

遠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前，俄國在自己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後一年，已陷於困難的經濟環境之中，燃料、五金、穀物極端缺乏，運輸破壞，人民大眾貧困，這一切把偉大的國家推向貧窮的邊緣。受到調查和統計的工業品總產量，只達到一九一三年水準的百分之三十，而例如生鐵的鑄鑄，則只達到百分之七，穀物之播種面積和收穫，約佔戰前時期的三分之一。由貶值到極點的紙幣代表出來的流通中之貨幣量，折合黃金只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九，在此種困難環境中，所

需要全國財政資源，依其規模來說，沒有超過戰前國家預算百分之四十二。

在蘇維埃國家的條件中，復興國民經濟的任務，按本質來說，與在新原則上改造整個經濟體系是不可分的。

老實說，其某些部門恢復舊觀，是大可不必的；因為此種陳舊的，完全不適合於業已形成的社會，國家和經濟的結構。財政制度必須從新建立起來，顧到新的條件和新的任務。這，不言而喻的，把事情弄得複雜了。還有別種程序的困難。開始整理財政制度時，曾經遇到貨幣流通非常不利的狀態。另一方面，國家的政策不能不利用財政的因素，作為它自己實現新的經濟和社會的目的，以保護建立了新生活的社會各階級以及與舊制度的殘餘，——在當時是很多的，——作鬥爭的有力武器。

從外部的，算術的方面來說，復興的經濟任務，是在儘量短促的時期內，把生產的指標提高到一九一三年的水準。而這一點，在一九二六——二七年，基本上已經達到了；但此種情形本身，還不能成爲巨大的慶幸，因為一九一三年，尤其是對在新國家前面業已提出完全新目的之一九二六——二七年，隨便怎樣都不是理想的。可是，復興過程的完成，是非常重要的階級。它意味了業已達到解決吾國社會主義改造任務所必需的第三條件。

在復興的年份內，蘇聯國家預算的增長，是非常之快，聯盟預算和各加盟共和國預算的歲入。從一九二三——二四年的三十三億盧布（當時預算年度是從十月一日開始，而現在是從一月一日開始）增至一九二五——二六年的四十億盧布。從國家財產及企業的收入，在一九二五——二六年已佔二十億盧布左右。

在緊張的復興工作時期的三年內，國家預算集合了九十三億盧布，而按地方的預算，則曾經募集了二十五億盧布之譜。在這幾達一百二十億盧布總數中，有一半以上曾被派作國民經濟的經費。

在這卓絕的事實中，表明了蘇聯財政制度在國民經濟復興過程中，非常重要的意義。此種政制度表明了自己是保證只用本國的力量和資財來完成國民經濟復興的複雜和困難計劃的那種國民收入分配有力因素。

國民經濟健全和恢復的觸目指標，是施行於一九二四年春季的幣制改革，後者提供全國以黃金及銀行商業資產為保證的國家銀行券型式的健全貨幣。預算的平衡，無須發行新的貨幣，不像復興時期開始的那樣；而且因為倚靠日益增長的商品流轉的貨幣改革，迅速地解決了硬幣的任務。應當指出，當貨幣的洪水氾濫整個歐洲時，蘇聯未必不是世界上走到硬幣道路的第一個大

國。幣制的改革，不僅替國民經濟的健全和發展，而，自然，特別是替財政制度創立了順利的條件；它爲這一點，做得格外多。在復興時期開始前，以無量數的，而最後貶值的紙幣代表出來的全國貨幣流通黃金計算，數目非常微小，不到幾萬萬金盧布；而方興未艾的國家，却需要許多健全的貨幣。因此，在完成幣制改革之後，國家銀行在其自己活動的最初幾年，應當發行自己的銀行券，以供業務週轉的需要。此種已與預算需要沒有聯繫的純粹銀行的發行，提供了幾十萬萬補充的盧布，用以組織新的經濟體系。同時展開了的信用機關之網，把日益增長的經濟上暫時閒置的貨幣資源，組織爲正確的銀行週轉，並以此創立了完成復興國民經濟任務的財政新源泉。

△當希特勒軍隊瘋狂般進攻蘇聯的初期，它在蘇聯所佔領的地方，根據美國記者斯諾氏的估計，幾乎相當於美國全部東方和南方各州，包括台薩斯在內。那裏的人口約達六、七千萬，也就等於全部美國人口的半數。這個區域佔蘇聯整個國土的十分之一，它是全蘇聯最發達的十分之一，其中有蘇聯使用中的煤礦二分之一，全國電力半數以上和鐵道的百分之三十都已失掉。這些地區之淪陷，對蘇聯整個國民經濟實有重大的影響，同時這些地區之收復，在蘇聯國民經濟上的意義也極重大，但完全復興，尚需時日。一九四六年十月廿三日美國合衆社社長貝利氏會問斯大林：「復興俄國西部被毀區域，需要多少時候？」斯大林的答覆，是：「至少六、七年。」從這

裏可以知道，戰後蘇聯復興工作之巨大規模。因此，戰後蘇聯新五年計劃規定：『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〇年蘇聯五年計劃基本的經濟政注任務，就在於恢復國內曾被蹂躪的區域，恢復工業及農業到戰前的水準，然後大大地超過這個水準』。同時新五年計劃規定『在一九四六年完成國民經濟的縮後改造，並利用軍需工業的生產能力，以便繼續增加蘇聯的經濟力量。』

關於蘇聯工業之復興，瓦志辛尼斯基氏曾經這樣說過：『與戰前水準相比較，工業製造品的生產差不多要增加一倍半，同時保證重工業及鐵道運輸業的首先恢復和發展，沒有這個，蘇聯全國國民經濟迅速而順利的復興和發展，是不可能的。沒有重工業的迅速復興，不能夠鞏固國內在技術及經濟上的獨立性。如在這件事上的遲緩，就是意味着喪失了曾在愛國縮爭期間保證我們軍事的事，經濟的以及政治的勝利的那些物質的先決條件。』

戰後新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即是一九四六年，在復興蘇聯國經濟方面已有很大的成就。就在這一年中，工業各重要部門：冶金、煤、石油和汽車製造的生產，都增加了。恢復的和重新建設的企業，逐一的開了工。復興起來的伏爾霍夫製鉛廠和德聶泊洛·傑爾靜斯基肥料廠，許多的鋸爐和馬丁爐，其中包括『亞爾夫煉鋼廠』，馬蓋也夫廠，德聶泊洛·傑爾靜斯基等廠，都已開工了。烏拉爾和中央亞細亞工廠裏的不久以前造好的鋸爐，馬丁爐和壓延工場都已有出品。以斯大

林命名的白海——波羅的海運河，也恢復了，剛恢復的聶泊河水電廠的第一個鍋爐，也在開工的前夜。

一九四六年，蘇聯的工業正在過渡到平時產品的生產。代替了取消的彈藥，迫擊砲和坦克工業的人民委員部，在它們的企業和幹部基礎上，建立了新的國務部，這些國務部，是受命來組織大量生產國民經濟所需要的機器和工具的。像以基洛夫命名的烏拉爾廠那樣龐大的坦克廠，已經在製造農業用的拖拉機了。從前生產軍事配備的工廠，現在都愈來愈多地用生產工業上需要的機器和設備，這種改造的方法，祇有在那不知道生產工具私有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裏才有可能。社會主義國家，擁有國民經濟的全部資源，有能力應用考慮得很周密的經濟組織方法，以保證迅速地，無障礙地從戰時的條件渡到平時的條件，而蘇聯的有計劃的財政制度，在這復興和發展國民經濟中，也將如過去一樣，起着優越的作用。△（起首及結尾有△號的一段，是由譯者所加的）。

2. 全國工業化與財政

國民經濟復興過程順利的完成，創立了所謂橋頭堡，這對廣闊國家工業化有其一般及概括任

務的巨大工作之開始，是必要的。這個目的直到法西斯德國背信進攻之前，是蘇維埃國家整個經濟政策的基本彈簧。

全國工業化的廣泛計劃，在極爲著名的發展國民經濟的三次斯大林五年計劃中，最明顯和最完全地表現出來。五年計劃時代開始於一九二八年秋季，而在一九四二年，被機械地打斷，當時第三次五年計劃只完成到第四個年度。

在經濟復興時期，生產和再生產過程的組織，是基本的任務。現在許多需要基本修理而尙未動用的基金，重大地幫助了此種任務之解決。在工業化時期，說到巨大投資的計劃，不僅是對工業而言，而且也對農村經濟以及國民經濟的其他部門而言。

實現五年計劃的財政可能之順利指標，是：把動員國民收入的預算和信用方法聯結在由已懷抱中去的蘇維埃財政制度，業已在自己的第一行中展開了。它已提供了充分可信的證明，在它幫助之下，最負責項目中的國民收入之分配，可能按照計劃來指派。最負責的項目，是把過去的國民收入劃分爲兩部份：被消費的，以及被指派到投資中去的。因爲五年計劃的財政任務，是在保證國民經濟投資的巨大綱領，那末在分配國民收入的過程中，財政制度的卓越作用，是勇敢的，而且是好好地考慮過的計劃之實現的可靠保證。

誠然，着手實行第一次五年計劃時的外部環境，是欠順利的。如所週知，在一九二九年曾經爆發了臨於歐洲和美洲，直到一九三二——三三年，而以後則轉化為嚴重蕭條的世界經濟恐慌。世界恐慌沒有包括，而且也不能包括蘇聯的經濟，因為這裏國民經濟的自發性，已被計劃根本地消滅了。可是對國家所需要的，與外國的經濟聯繫，也受到重大的苦惱；第一是由於世界的對外貿易流轉，殘酷地減縮了，而第二是因為農村經濟和工業原料（蘇聯當時輸出的主要項目）的價格，比工業製成品（蘇聯當時輸入的主要物品）的價格，跌得更低。

此種情形更加有力地着重指出：實現分配國民收入明確和有意的組織計劃之巨大意義。在一九三〇年，曾經施行過兩次大改革——財政的，及信用的。在其總結中，提供了直到今天還保持其基本特點，並在三次五年計劃以及對德作戰時期受過考驗的有效的財政制度。

在五年計劃系列最初開展，主要的困難是在於工業以及經濟的其他部門最初的巨大投資，不能立刻提供可以覺得的經濟的，從而也是財政的結果。需要時間以建設製造廠和安排那裏的生產。許多工業建設完工的限期，都超出第一次五年計劃的範圍之外。在此種條件中，外國的信用，可能成爲被充的來源；但恰巧在第一次計劃年份中，由於政治的動機，不能不少轉此種來源的念頭。除了其他重要的原因之外，不能求助於此種來源，還因為在這個時候，外國的資本市

場，在世界經濟恐慌的打擊之下，處於虛弱的狀態。因此，一切財政上的打算，不得不只靠國內資源來進行。

社會主義經濟內部的累積，在財政制度幫助之下，曾經這樣組織：它們的基本量，是處在國家的手裏，儘量加強形成此種積累的過程，會是切時的任務。此種任務由於最積極地促進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幫助生產成本大大的減輕，以及新建設的省錢之經濟政策而順利地解決了。在最後於生產成本之降低的商品價格之逐漸降低的條件之下，這歸結到國家企業積累的增長。

在第一次五年計劃年份內。工人和職員的數目增長了二倍多，而在一九三二年，此種數目說一九一三年在俄國高出一倍。就只這一點，在國民收入預算內提供了切膚的結果，它（以不變的價格計算）在五年內，增長了百分之八十六，而到這個時期結束時，達到四百五十五億盧布。失業歸入故事之列了。但增長的，不僅是工人的數目，勞動的素質也改進了，因為比一九一三年的水準，例如在大工業中每一工人的年度生產率，提高了差不多兩倍。

自然，除了此種經濟因素之外，勞動的技術裝備以及社會的整個新的政治社會結構在同一方向的行動，成爲了勞動生產率增長的基礎。勞動生產率的高漲，多半也是工人和農民大眾奮發的結果。此種奮發歸結到工廠，製造廠，工場，集體農場，個別區域，鐵道等等競賽的繁盛。

第一次五年計劃的財政結果，顯明地表現於社會化經濟的資源，後者根據計劃所規定，透過財度制度，在五年內可得到七百零九億盧布之數目，而實際上在四年半內所彙集的規模，已達八百九十九億盧布。這些資財，是第一次五年計劃經費的基本源泉；資財的總容量，計在一千二百億盧布以上，而社會化的經濟資財，則佔百分之七十五。動員五年計劃各種資財百分之六十一的任務，落在其份額上的國家預算，在五年計劃的經費中，起着基本的作用。

以後兩次五年計劃（雖然爲着實現它們所需要的資源之總容量，比第一次計劃時要多得多）的財政任務之解決，已經沒有那樣困難，後者在全國廣泛工業化開始時，是不可避免的。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投資，已經採取了製造廠、電站、機車、車床、拖拉機以及許多分段的集體經濟田地等的形式。國民收入容量飛快的增長，使財政制度對於籌劃全國工業化經費和任務更加容易。同時應當指出的，計劃化經濟與其管理，以及在企業建設中所積累起來的經驗之偉大的價值。

在第一次五年計劃年份內，國民經濟投資的總結，計達六百億盧布。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中（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年），它已超過一千一百四十七億盧布。在十年內，一千一百四十七億盧布投資的總數，對偉大人民創造精力進一步的上升，創立了鞏固的基礎。應當指出，在第一次五年計劃前，投資計爲二百六十五億盧布。第三次五年計劃時期（一九三八——一九四二年），投

資的綱領會被規定爲一千九百二十億盧布的範圍，此種新綱領順利的完成，曾被一九四一年法西斯軍隊對蘇聯的進攻所破壞了。

無庸置疑，蘇維埃軍隊及蘇維埃人民對希特勒侵犯英勇的抵抗，是以祖國土地保衛者的空前勇敢而著稱，其根源是在過去幾年英勇時日中滋養起來的；那個時候，在蘇維埃土地偉大的空間上，經濟的陳舊的土地制度，根據斯大林天才的計劃，以驚人的速度，把自己的位置讓給了新的工業經濟。全國技術的裝備，勞動素質的增長，人民大眾政治的成熟，完成偉大事業時所積累起來的經驗，這一切都是蘇維埃國家不可摧毀性的可靠的保證。在解決和平建設最困難的任務時會受鍛煉的這個國家的財政制度，是很和諧的樂器，而在艱苦作試煉年份內，是成爲被磨得更爲銳利的武器了。

3. 文化革命與財政

在蘇聯國家預算中，以及把革命和不列入預算的一切經費來源聯結起來的財政總計劃中，除了國民經濟經費支出最大的項目之外，滿足人民社會文化需要的支出，按其規模來說，佔着第二位。有趣地指出一個事實：蘇聯國家預算之總結，在一九二六——二七年，已達到一九一三年的

水準；但在二十年代剛開始時，那個時候的預算，比一九一三年的預算稍微高出三分之一，而國民教育領域內所已達到的結果，則已超出一九一三年同一領域的指標。關於全國文化發展的此種高度的關心，不變地透過蘇維埃歷史的各個年份，如我們在下面所看到，此種傾向甚至在艱苦試驗的年份，以及在偉大衛國戰爭非常緊張的時候，依然保持其效力。

根據第一次五年計劃，爲着社會文化目的，會從一切來源支出二百四十億盧布左右；第二次五年計劃三倍於此數多。在第三次五年計劃中，曾經指定更爲豐厚的數目，因爲迅速增長的國民收入，對這提供了一切的可能。

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時期，曾經完完地解決了全蘇聯領土內用本族語文的初級普及教育和教育的最困難與最高尚的任務；恰恰也在同一時期，曾經最終地清算了失業，把幫助失業者基金的大筆款項，解放出來，用於其他的文化目的上去，特別是用於人民的醫藥服務上去。

社會文化機關和措施的經費，是從各種不同的來源籌劃出來的，其中是預算，特別是在各加盟共和國和地方蘇維埃的預算中，佔着顯著的地位。依存於工資基金之增長而增加起來的職工聯合會的基金，也列在這些來源之內。

職工聯合會在其會員中進行繁盛的文化教育工作。企業和機關的職員，在勞動日完畢之後，

過着活潑的職工聯合會的生活。在一些房間中，研究外國語文，而在別些房間中，則研究經濟和政治的課程，在這邊召開音樂會，演劇或看新的影片，而在那邊則學習裁衣與縫紉。象棋組，體育組，唱歌組，音樂組到處工作着，有時全體歡樂和跳舞。倚靠職工會的經費，在各企業中到處組織圖書館，閱報室，參觀團，體育場，競技場等等。

合作社的組織，也同樣地劃出大筆款項以作社員的文化服務。在國營企業中，經濟基金之一部份，必須對勞動者文化需要服務之支付。各種自由團體，爲着同樣的目的，特別是在發展體育領域內，支出巨大的數目。

鄉村在渺小地段上的陳舊生產方法根本改造之後，廣泛地附和到總的文化運動和高漲中去。與農鄉蘇維埃和陸工作的集體農場的金錢，也應當綜合到全國社會文化需要支出的總數中去。鄉村蘇維埃的預算，把其資財的最大部份，用於文化目的之上。

集體農場所達到的富裕的頗大水準，是在鄉村中到處促對其文化不可壓制的引力，對知識不倦渴求的物質基礎。各種集體農場，認爲在它那裏具有領導積極文化工作的鄉村俱樂部（閱覽室），是它日常生活的必要條件。

對滿足文化需要的國家和社會資源的洪流，自然地喚起勞動者從個人收入中爲着同樣目的而

支出的回流。千百萬份報紙，圖書，雜誌被非常廣泛的讀者羣，以及大小圖書館和閱覽室的網兒所迅速地吞沒。

一切這些事實和現象，在無偏頗的觀察家前面，展開蘇維埃政權年份內在全國所完成的真正文化革命之圖景。

構成蘇聯政治制度特徵之一的社會主義民主，在偉大國家的現代文化生活中，找到了它自己明顯和美滿的表現。蘇聯文化運動最有價值的特徵之一，是廣大羣衆對把握幾世紀來在世界及民族文化寶庫所積累起來的一切最偉大和最高貴遺產的意圖。

指出一點就夠，蘇維埃各民族的熱愛，與對最偉大的俄國詩人普希金深刻的尊敬之情感結合起來，後者之創作，現在已被譯成各種文字和蘇聯各民族的方言。只在發生了文化革命之後，普希金才成爲真正全民的詩人。出版社來不及滿足對詩人全集之需要。仗着翻譯及新出版，其他民族的偉大詩人和作家們，也成爲大衆的資產。外國優秀作家的名字和創作，也成爲不久以前一般說來脛籟還是珍品的那些社會階層所熟知。

在國民教育領域內，解決了普及義務教育任務之後，曾經提出並解決了在七年制學校和同時發展第十級學校的範圍內，都有市民義務教育的任務。

在保護人民健康領域內，工作是在兩條戰線上進行。一方面消滅不久以前由於病床及醫師之不足而造成之人民醫藥無助的狀態；一九一三年曾有一萬九千八百個醫師，一九三六年——九萬零七百個醫師。另一方面，對人民康健的保護，以廣泛的陣線展開防疫的綱領。

蘇聯的立法，保障孕婦和產婦。一九四四年，此種立法會大大地擴充。規定孕婦產前三十天和產後四十二天之休假，其工資由國家照付，孕婦與亂母補充的口糧，增加一倍，禁止吸收孕婦作額外的工作，和乳母作夜工，立法保證對着小孩的扶助，建設幼稚園，兒童院，夏令營，學齡以前的教育等等。免費的醫衛幫助之支出，達數十億盧布。對療養院，休養所及溫泉等等，也支出巨大的資財。

預算的巨大數目，每年為扶助多子母親而撥給。一九四五年的預算中，為着此種目的，曾經指定十五億盧布左右。戰時曾經頒佈法令，着重指出社會對多子母親的尊敬。母親——英雄的榮譽，以及特殊的獎狀，均為他們所專有。

專靠國家及社會來源而構成的勞動者社會保險費用，佔着極大的數目。最近幾年來，它們已被包括到國家的總預算中去。根據此種預算執行的報告，例如在一九四〇年，它們計佔八十六億盧布。這些資財用以支付因疾病，年老，以用其他不幸事件而暫時或永久失去勞動能力的勞動者

之撫卹金和補助費，用以支付殘廢者的勞動建設，殘廢者救濟院的經費，多子母親的津貼等等。

在結論中，可以從一九四〇年預算執行的報告，編製兩種數字：從人民方面來的賦稅和公債，提供預算一百八十四億盧布，而為社會文化需要的預算支出，計達四百零九億盧布。

第六章 戰時蘇聯的財政

△現時反法西斯的戰爭，早已勝利地結束，而蘇聯的國民經濟，亦已轉向戰後改造與和平發展的時期。根據一九四六——一九五〇年蘇聯新五年計劃，國民經濟集中化投資的規模爲二千五百零三億盧布，實行恢復並新建企業的價值，爲二千三百四十億盧布。憑藉社會主義的經濟力量，蘇聯財政機關曾經確保源源供應日益增加的經費，以進行戰爭；確保滿足國民經濟的要求，並確保文化的發展。及到戰爭快結束時，蘇聯財政已變得比戰爭最初階段更加殷實了。以強有力的社會主義經濟爲基礎的蘇維埃財政之特徵與優點，便提供了關於這一方面的一切必要條件。我們從蘇聯的國家預算中，固可看到蘇維埃財政的穩定，但從蘇聯戰時的財政中，也可看到蘇維埃財政的活力。

一九四四年度蘇聯國家預算的執行，歲入超過歲出四十八億盧布，而在一九四五年的超出額，也達三十四億盧布。根據新五年計劃，一九四六年蘇聯國家預算規定歲入達三千三百三十四

億盧布，而歲出則達三千一百九十三億盧布；與一九四五年相比，計歲入增加百分之十四又四，歲出增加百分之六又九。

蘇聯國家預算收入的主要來源：第一，是經濟週轉稅，它在一九四六年達二千零八億一千三百萬盧布，在預算總收入中，佔百分之六十又二。其次是工業企業利關稅，它在一九四六年達一百六十八億四千八百萬盧布。第三，是租稅基金，它在一九四六年達二百三十五億零三百萬盧布。最後，國家收入中來自發行公債及動用儲蓄銀行存款的，計達二百五十四億七千八百萬盧布。

關於歲出方面，國家經濟的投資，佔一九四六年蘇聯國家總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二，社會文化事業費，佔百分之二十六又一。

現在我們把蘇聯戰時的財政作一回顧，從這裏也可以看到蘇維埃財政的活力。△（起首及結尾有△的一段，是譯者所加的）。

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全世界緊張的外部政治環境，已尖銳到了極端，這迫使蘇維埃國家採取預防的相當措施。這，自然，引起國防支出的提高，後者在國民經濟和國民文化建設中，是特種『附加的支出』，而且是意料之外的情形。

到三十年末期，規定蘇聯國防支出規模的主要因素，是地理的因素。它不得不在邊界達六萬五千里，以及與十四個外國接壤的兩個大陸上，建設無限面積的國防。在這無限修長的邊界中，只有與北冰洋直接相連的那一部份，才受到自然的保障。但為保衛國家的其餘邊界，就須引起經常和龐大的支出。不言而喻的，邊境國防支出的預算數字，對於一個國家的國防能力，還不夠說明。這只是真正的附加支出罷了。國防的能力，是包括在構成所謂戰爭經濟潛力的那些條件之總和中。從這個觀點來看，蘇聯遠在第一次五年計劃結束時，就已大規模地鍛煉出了它自己的國防能力，那個時候業已奠定了全國工業化的鞏固基礎，當時（一九三二年）所已達到的工業化程度，保證在國內大規模地生產現代武器的可能。在更廣泛規模內繼續全國工業化的最近幾年，使蘇聯國防能力的經濟方面，更為鞏固了。

在第一次及第二次五年計劃年份內，對武裝力量之經費支出，常常是反映蘇維埃國家愛好和平的政策。指出下面一點，就是證明：在第二次五年計劃年份內（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年），這類的全部支出，其總數少於最後一個和平年份——一九四〇年的相當支出；那個時候，在西歐已經燃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燎原之火，於是第二次五年計劃時期，已由納粹在德國奪取國家政權蒙上一層陰影。

一九三九年在歐洲開始的戰爭，不僅迫使歐洲國家，而且也迫使全世界警醒起來。在提付最高蘇維埃批准的一九四一年蘇聯國家預算中，國防費用預定為七百零九億盧布。政府這個提議，引起立法院一致的贊成；因為戰爭的威脅，已經迫近蘇聯的邊境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軍隊背信地而且突然地進攻蘇聯的西境。在蘇聯的財政制度前面提出供給空前戰費的巨大而複雜的任務。

在把資源朝向新用途的意義上說，蘇聯財政制度表現出充分的機動性。戰爭對蘇聯是在極端不利的環境中開始，因為敵人威脅着利用其一切的優點作突然的進攻，奪取蘇聯領土的頗大空間，並迫近全國的心臟——莫斯科。在財政的關係上說，這首先意味着國家預算收入大部份的耗費。

因為，在一九四一年預算中，撥給國防的費用，依其規模來說，是很大的；而在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即是開戰的上半年，用於作戰的支出，只預算設所預定的高出二百零六億盧布。這裏應當指出，在本場合以及以後的戰費支出，只根據兩個機關的預算——國防委員會和陸、海軍部——的預算來了解預算的支出。除了這些用於作戰的直接支出之外，在戰爭行動開始之後，因與國民經濟轉到戰爭的步調，因與大部份工業企業之移到東部各區，以預防敵人的攻擊，以及與軍需工業的新企業之建設相關聯，蘇聯國家預算負起支出的巨大責任。往後又把付給軍人及其家

屬之撫卹金和津貼費的責任，課在預算的身上。戰時這一切支出，是透過國民經濟與社會文化費用的預算而進行的。

根據一九四一年的和平預算草案，指撥給兩個軍事部會的費用，計達七百零九億盧布。如上面所已提出，此種預算數字提高的結果，計達二百零六億盧布；即是說，在戰爭的前半年，直接的軍費支出，約為五百億盧布，每晝夜的平均戰費，為兩億五千九百萬盧布。可以明瞭，隨着軍事行動進一步的發展，指這個標應當增加起來。因此，在財政制度前面提出雙重的任務：保證軍費支出的完全充足，並彌補被佔領各省收入來源之喪失。

戰爭上半年的財政任務，首先是用減縮國民經濟經費的支出（達二百一十六億盧布）以及減縮社會文化經費的支出（計達一百六十五億盧布）來解決的。同時採取措施，尋找新的收入，關於這一點，以後將要說到。

一九四一年蘇聯的歲入預算，曾被執行的總數，為一千九百一十四億盧布，對比計劃的二千一百六十億盧布。從這裏可以明白地看到，希特勒打算奪取蘇聯人口稠密，工業集中，以及富於工業原料和農產品來源的各區，以削弱蘇聯全國經濟威力，並使其財政和經濟解體；這個計劃，遠在一九四一年就已破產了。蘇維埃國家先行的全部經濟政策，是朝向把工業化包括全國與一切

廣大的區域，並使在經濟上最落後的東部各區，儘快地趕上中部的工業省份。在嚴重的戰爭考驗年份內，這個政策對國家有其偉大的功績。

在一九四二年預算中，已執行的總數，爲一千八百二十八億盧布，戰費的支出，佔一千零八十四億盧布，即是約佔百分之六十。戰費每晝夜平均支出規定爲二億九千七百萬盧布，即是差不多高出戰爭上半年的水準百分之十五。

一九四三年，蘇聯國家預算被完成的規模，爲二千一百億盧布，其中用於直接的軍事費用，計達一千二百七十億盧布（佔支出總額數百分之六十）。每晝夜的戰費支出，提高到百分之十四。在這個時候，補充的財政措施體系，業已開展，於是戰費支出雖增長百分之十四，但是沒有引起財政上的困難。

可是在每一戰爭年份，有它自己特殊的任務和顧慮。一九四三年，希特勒主義者已從大部份蘇維埃領土上被趕出去。此種敵對的軍事機構之被驅逐和殲滅，是由在比較短促時期內提供顯著結果的蘇維埃戰略之主導所造成的。一九四三年，德國人的力量在列寧格勒及庫爾斯克受到突然的殲滅。

從德國人野蠻下解放出來的蘇維埃領土，有了可怕景象：一切都受砲火所毀，——一切都

被退却的，獸性的法西斯匪羣所消滅。一九四四年初，只在蘇俄被佔領的各省中，他們約破壞和消滅了五百個城市和工人居住區，一萬四千個鄉鎮和村落。同時在德國人最初進攻時期，法西斯主義者佔領了莫斯科省領土的百分之四十二。他們在這裏焚燒了二千二百八十個鄉鎮和村落，許多城市，四萬七千二百四十六幢集體農民的房屋，以及一萬三千幢以上城市的房屋，破壞並消滅了十六萬五千多件農具。毀損或完全破壞了良好的工業企業。只莫斯科省一部份被破壞的價值之非正式的估計，在蘇聯最高蘇維埃全體大會上提供的數字就超過七十億盧布。除此之外，德國人所帶給蘇維埃公民的損失，超過一百五十億盧布。這一局部的實例，就觸目地描寫出全國被破壞的規模。至於下述難以計算的東西，還沒有列入這個數字中去。如：被打死的，被弄成畸形的，並被驅為德人奴隸的和平居民，以及由自由民族的死敵——德國法西斯主義者所蓄意組織的對他們的苦楚，困厄和受難。

遠在一九四三年，蘇維埃領土從希特勒主義者方面迅速的解放，在財政制度前面提出新的補充任務，儘可能地提供充足的資財，以便在被解放的土地上，進行復興的工作。這些工作的費用，被包括在國家歲出中，列在『國民經濟經費』的項下，或者被包括在社會文化支出的項下，如果事情是說到文化教育機關，例如學校，醫院等等之復興的話。

在一九四三年預算中，對被戰爭所破壞的復興工作之新支出，會已確定，而在一九四四年的預算草案中，其規模特別龐大。

一九四四年，蘇聯預算會經依照概算而執行，計歲入總數為二千六百八十億盧布，而歲出則為二千六百三十億盧布，即是歲入高出五十億盧布。其戰費計佔一千三百七十九億盧布，約佔全部預算支出百分之五十二又四。每晝夜的戰費規定為三億七千七百萬盧布。

一九四五年，蘇聯國家預算已批准的總數為三千零七十七億盧布。在這個預算草案中，戰費根據一九四四年的水準而核定，即是一千三百七十九億盧布。但因國民經濟支出大大的增加，主要是因曾被佔領的各地之國民經濟復興的結果，以及社會文化支出巨大增長的結果，在一九四五年預算中，戰費降低了，並只佔百分之四十四又五。

需要把國家歲入之過半用於直接戰費的戰爭，不僅使歲入預算，而且也使歲入預算的結構起了重大的變態。但歲入結構中的變化，依事物的本質來說，比歲出的變化比較小些。

也如在平時條件之下一樣，由合作社化的部份之積累加以補充的國營經濟之積累，在戰時依然是蘇聯歲入的基礎。但在戰時，廣泛地包括全體人民，以及愛國的個人和集體的各種捐輸——貨幣的和實物的，作為大批的公債而鞏固起來的人民個人收入課稅之預算意義，大大地加強起來。

了。

在戰爭年份內，國營的以及合作的企業和機關之累積，不斷地增長起來了。它們在一九四二年，計達一千零九十九億盧布，而在次年，——一千三百二十億盧布，以及一九四四年之概算規模，爲一千四百八十六億盧布。對歲入的總數來說，約提供百分之六十一。此類歲入有力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把國營經濟移到戰爭的軌道，迅速地把握前綫所需的物品之大量的生產，迅速地運用撤退到東方去的企業，以及廣泛地應用自流的生產制度，由於產品成本之奮勇的減低，達到了重大的財政結果。軍用品的生產和供給的成本之降低，也提供了重大地降低戰爭費用的另一結果，許多國防商品的價格降低了。到一九四四年低，此種降低提供歲出預算節省了五百億盧布。不言而喻的，降低的此種數目，是加入國營企業積累的預算中去。

戰時人民自願的捐輸，也給蘇聯預算以極爲重大的支持；遠在一九四二年，它們已佔四百一十二億盧布，其中約有一半，是自動獻納的；在一九四三年，預算收入的此種來源，已提供五百五十四億盧布，而在一九四四年，預算可以得到六百六十二億盧布（約佔是年全部歲入百分之二十四又七）。

人民的捐稅負擔，主要是由新的戰爭捐稅之施行而增加起來，而以後則對未婚者，鰥居者和

小家庭的公民以及農業稅率和小地方稅率之提高而增加起來。

新的戰爭捐稅（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法律），是向蘇聯整個空間中凡年達十八歲的兩性全體公民徵收之。已屆服役年齡而免除兵役的公民，依照稅額提高百分之五十繳納。現役軍人，他們家庭的成員，殘廢者，年滿六十歲以上的男子，以及年滿五十五歲以上的婦女等等，豁免捐稅。捐稅是按照收入的方式而建立，並按月徵收。當年收入達一千八百盧布者，全年的課稅額為一千零二十盧布，收入在二萬四千盧布以上者，全年之課稅額為二千七百盧布，或者每月課稅二百二十五盧布。集體農民和個體農民之課稅額，每年搖擺於一百五十至六百盧布範圍之內。法律預定許多優待或完全的免稅。到一九四四年，戰時捐稅提供預算三百三十億盧布。

一九四一底年，對未婚者，鰥居者，以及沒有小孩或者有一兩個小孩的小家庭之公民施行課稅，凡男子年達二十歲以上至五十歲者，以及婦女年達二十歲以上至四十五歲者均須繳納之。此種捐稅是按照收入課徵：繳納所得稅而沒有小孩子的公民，其納稅依所得附加百分之六，有一個小孩者，附加百分之一，以及有兩個小孩者，附加百分之〇·五；集體農民每年相當地繳納一百五十盧布，五十盧布及二十五盧布。現役軍人，他們的妻子，殘廢者，在戰爭喪失兒女的公民，以及從國家領到津貼以贍養兒女者，概行免稅。

也如在平時一樣，戰時公民自願捐輸到預算中去的，依其絕大的規模，約等於必須繳納的，即是等於捐稅的總數。戰時自願捐輸之重大特點，是把明顯地反映廣大人民大眾愛國情感和情緒高度昂揚的對國防及紅軍基金捐輸的洪流，聯結到公債及儲蓄銀行存款的通常形式中去。

在戰爭年份內，國家在人民中發行過四次公債。一九四二年的戰債，達一百億盧布，在十天中認購完畢；認購的總數，為一百三十一億八千六百萬盧布；發行於一九四三年中的第二次戰債，也跟着得到優越的成加。此次戰債的總數，為一百二十億盧布，而認購的規模，達二百零八億四千三百萬盧布。這給一九四四年發行第三次戰債時有了根據，把發行的總數，增加到二百五十億盧布；而認購的總數，則達二百八十九億六千三百萬盧布。最後，一九四五年的第四次戰債，其發行總數二百五十億盧布，在八天內認購的達二百六十億八千五百萬盧布。

因此，四次戰債被認購的總數，約達九百億盧布。爲着估計這些財政措施的規模，可以指出，由戰前人民認購公債的預算收入，計達五百億盧布。應當也把價值在一百二十億盧布以上的附加的實物公債，加到戰時公債的收入中去。

同時，隨着人民各個階層非常廣泛地參加公債的認購，在蘇維埃人民中產生了另外一種社會運動，它給國家前線以及從德國佔領下解放出來的各區以各種的幫助。此種愛國運動，遠在開戰

之初就已產生，而在戰爭的全期中發揚光大起來。蘇聯軍隊光榮的勝利，喚起此種人民無量數的表現。

首先是社會的倡導，創立了國防的基金，蘇聯軍隊的基金。蘇維埃土地上各個角落的勞動者之捐輸——從個人和各種團體，從集體農場，從信教者的會社，從戰鬥前綫上的部隊——流到此種基金中去。到一九四四年底，繳納到這社基金中去的超過一百六十億盧布。通常這些捐輸是伴隨着打給史大林的電報，請求把此種捐款用以購置以捐款認識為命名的坦克和飛機。除了貨幣的捐款之外，加入此種基金中去的，還有金，銀，貴重物品，食糧，國家公債票（總數達四十億盧布以上）。這表明國債之提早的還償，以及對此種債務的預算支出之減少。常常為着國防的基金，在集體農場中劃出特定的面積，以進行特別的播種。例如：一九四三年喬治亞的集體農民，為着國防基金以及幫助解放區，播種了五千五百公頃穀物和蔬菜。

表現愛國情緒的另一種方式，是對前綫上戰鬥軍隊的贈品。例如吉爾吉斯共和國的勞動者，在一九四四年前把三百輛禮物以及六十萬件以上保暖的物品，送到前綫上去；哈薩克共和國的勞動者們贈送一千六百多輛禮品等等，如此類推。在烏拉爾的人民中，募集金錢以武裝由烏拉爾優秀人物所組成的自願坦克師團。

雖然直接的戰費支出，佔蘇維埃國家預算的一半多，但一九四四年的預算，仍能劃出極大的資財以供社會文化的需要。爲着這些目的，在一九四四年，根據概算的統計材料，支出達五百一十五億盧布，對比一九四三年的三百七十七億盧布（增加百分之三十五又八）。自然，此種增長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與戰爭的環境有關的。指出下面一點就够，如有力地增長現役軍人家庭的社會保險，以及付給殘廢者之撫卹金等等。爲着對各種勞動部門加速訓練幹部之必要，引起學校經費的增加；因爲現時普及的義務教育是從七歲開始，以代替八歲。爲着高級學校以及科學研究院，也付出頗大的經費；因爲戰時那裏進行加強移到戰爭軌道的國民經濟之威力。最後，偉大的同盟國——美國和英國友誼的幫助，也使以物質資源滋養戰爭的任務，容易得多。

結 論

與希特勒主義的戰爭，對全世界一切愛好自由的民族，同時也對蘇聯人民艱難苦的試煉，後者被迫在它自己領土上，進行殘酷的流血戰爭，蘇維埃的財政制度，也受了艱苦的試煉，對這種制度來說，戰爭消滅了『不可能』這個字。戰時財政任務之解決，自然地支配一切其他的財政任務，並創立完全可以了解的財政緊張，後者考驗財政制度的彈性。如上面所已指出，考驗是完全滿意地通過了。

現在全世界已招展着勝利的旗幟，和各人所希望的和平，同時恢復國民經濟，特別是恢復被破壞的城市、鄉村、工業設備、建築物、文化機關和住宅基地之復興的巨大創造性工作的輪廓，已十分顯明地描繪出來了。此種偉大的，但同時也是高貴的工作，現在已經開始了。

戰爭揭出了勞動毅力的新後備，和應用勞動的新場合。戰爭成爲蘇聯巨大東方領土強力工業化的理由。這就在戰後依然如此，並有利於經濟的復興。戰爭擴充了成功地應用工業建設迅速方

法，以及在這些地方廣泛地利用糧料的範圍。這也存留在勞動者的積極性中。戰爭教會了在空前的規模中，應用生產的速流制度。這依然成爲生產工作方法的基礎，最後，戰爭成爲勞動生產率領域內新高峯剖明。

我們上面的解纏中，力圖指明蘇維埃的財政，不僅僅倚靠分配的關係，而且也倚靠生產，後者直接提供財政資源的基本量。因此，國民經濟復興的工作，也如三次五平計劃時，全國工業化的工作一樣，在復興的過程中，找到自己的資源。

現在必須提出稍微兩樣的問題，曾經負起戰爭重担的偉大國家之人民，對儘可能地加速復興的過程，並減少戰後貧困的時間，而感到血肉攸關的利益。我們對戰敗的德國，應當提出戰爭損失之完全的和文件式的數目。我們對任何一幢被焚毀的農舍，任何一個被破壞的建築物，任何一個被消滅的工廠，礦山，電站，對可惡的敵人不可放鬆。法西斯的犯罪者，應當完全地償付我們這個帳目。德國根據它的不幸的『蕭屬爾』的話，在五六年中，只爲備戰就耗費了九百億馬克，他們耗費了幾百億馬克以進行戰爭，這也指明可以從這個國家找到在可怕的戰爭時期，帶給蘇聯的損失。

不僅蘇聯一國受着法西斯侵犯殘酷的痛苦。被破壞的地帶非常廣泛，這無條件地以最不利的

形勢，影響到全世界的經濟生活行程中去；因此，受戰爭損壞的國家和省份，在儘可能地短促的時間內復興起來，感到共同的興趣。在聯合國密切合作的形式上，延長對付共同敵人之戰時的那種合作，在復興經濟中，是加速消弭戰爭惡魔般的後果，並組織愛好自由民族和平共居的嚴正條件之一。

蘇聯財政制度

著者 I. 博高列波夫

翻譯者 吳清友

印行者 天下圖書公司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四九年九月

北平第三版

蘇聯研究叢書

蘇聯社會·國家·人民

蘇聯企業經營

蘇聯計劃經濟

蘇聯工業史綱

蘇聯財政制度

蘇聯文藝科學

卡爾賓斯基著
辛露譯

杜布尼莫維茨著
康譯

科志敏諾夫著
友譯

布洛維爾著
昂譯

博高列波夫著
友譯

普洛特金著
友譯

天下圖書公司印行

北平地安門內米租庫二號

5.42

蘇聯財政制度

一九四九年九月北平三版

基本定價：四元五角（片紙）